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壹、研究動機

從 1930 年代的世界經濟大恐慌，顯示出全球性的國際政治經濟牽一髮而動全身的性質。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性的金融經濟組織紛紛成立，這些組織與許多先進國家為了全球的整體經濟發展，大舉地經濟援助與借款給經濟發展較為落後的國家。

然而，不同地區的落後國家卻因此擁有不同的發展結果。拉美國家的經濟借款從獨立以來一直依賴殖民母國，並持續向國際借款。不同於亞洲國家的狀況，拉美國家的經濟狀況有惡化趨勢，債務持續增加已使該地區成為世界經濟崩潰的潛在地雷。

從 1982 年墨西哥債務危機爆發後，針對債務問題，國際組織與先進國家不斷投入資金，以協助拉丁美洲國家處理債務問題。但令人困惑的是，拉美國家接受國際援助後，債務金額不降反升，從 1991 年的 4610 億美元至 2000 年升至 7405 億美金，國際金融機與美國介入拉美債務問題後，債務問題依舊存在。

本文研究主題是：為什麼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國家在進口替代工業化的策略下，自 1930 年代以來，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到了 1970 年代，這三個拉丁美洲國家算是經濟發展不錯，但 1982 年起，卻開始受債務問題而經濟發展遲緩。<sup>1</sup>

---

<sup>1</sup>拉美國家生產成長率在 1965-1973 為 3.7%，1973-1980 為 2.6%，1980-1989 為-0.6%。資料來源：朱章才譯，W.Bernecker 著，2000，《第三世界的覺醒與貧困》。台北：麥田，頁 49。

基本上，這三個國家債務問題持續惡化後，甚至於影響拉美人民的生存，進一步擴大拉美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因此，本文研究動機乃是試圖了解：為何國際組織與先進國家，協同拉美國家努力投入資源處理債務問題，結果卻導致債務金額不降反升？

## 貳、研究目的

本文要了解的是，為何債務問題處理的效果不彰，而使得債務問題重複發生的原因又是什麼？債務問題所造成的政治不穩定，帶給拉美國家的影響是什麼？簡言之，本文要了解造成這三個國家債務問題處理的效果不彰的原因與造成的影響。

本文假設並企圖證明的是，這三個拉美國家的現代化過程中，這三個拉美國家的社會、經濟與政治結構，是造成國際援助與三國政府無法降低債務金額，使債務問題惡化原因。

因此，可以歸納以下三點本文研究目的：

- 1.了解債務與政治政策的關係：究竟伊比利半島殖民母國留下的社會結構如何影響拉美國家的經濟發展？是否影響拉美政府的舉債發展政策？
- 2.債務對經濟發展之影響：當社會結構使這三個拉美國家資源分配不均，而政府舉債發展後，為什麼經濟成長的利益無法改善三個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而國家與外資投入的資本為什麼無法改善債務問題？
- 3.債務對社會不平等造成之結果：拉美國家自獨立以來，是否因

社會與經濟結構的影響，使債務無法改善？當舊有的政治結構開始轉型，包括阿根廷、巴西與墨西哥在內爆發債務危機後，第三波民主化對拉美債務問題會有什麼樣的影響？隨著民主化的擴展，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又是如何在拉美國家推動？

## 第二節 研究途徑與研究方法

### 壹、研究途徑

本文以國家取向的研究途徑(State-centered approaches to political economy)作為分析的基礎。由於本研究之問題意識為：為什麼債務問題處理持續惡化？債務金額持續增高？所以從「國家失靈」之角度去觀察國家與債務升高的關係，並了解政策的作為如何影響債務持續累積，應為較合理的作法。

學者 James Caporaso 與 David Levine 在《Theories of Political Economy》一書討論政治經濟學相關理論與研究途徑；本文使用該書對政治經濟方面的國家取向研究途徑(State-centered approaches to political economy)。<sup>2</sup>另外，學者彭懷恩指出第三世界的統合主義(Corporatism)，正說明國家如何以政治力介入國內經濟事務。<sup>3</sup>因此，本文在國家取向的研究途徑下，以統合主義解釋國家強力介入經濟事務後，造成債務問題處理的效果不彰。

當拉美國家獨立自 19 世紀獨立後，始終未切斷與殖民母國或先進國家的資本依賴關係。當 1930 年代的世界經濟大恐慌影響拉美國家經濟發展時，拉美國家面臨經濟改革的選擇。基本上，拉美國家欲切斷對外經濟依賴關係，所以選擇了進口替代工業化(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的發展政策。不過，拉美地區實行進口替代一直到 1980 年代出現債務危機時，才發現該機制無法處

---

<sup>2</sup> James Caporaso and David Levine, 1992, *Theories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p.181-196.

<sup>3</sup> 本文指的統合主義為國家權力扮演優勢角色，介入並分配經濟的發展，並滿足人民期望經濟改善需求，以威權政治的形發展。彭懷恩，2003，《政治學理論與方法論 Q&A》。台北：風雲論壇，頁 298-301。

理經濟危機所造成的問題。於是，拉美國家領導人又面臨新抉擇。

結果，拉美國家接受國際金融機構的建議，實行以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為原則的經濟改革政策。<sup>4</sup>當一連串的改革實行之後，阿根廷、巴西與墨西哥卻在不同的時期間面臨相同的經濟危機，並衍生社會不滿形成社會運動。也由於國家無力處理債務升高狀況，以致演變成拉美地區多次的經濟危機。

因此，本文觀察的重點是：為什麼這三個國家在 1930 年代的經濟大恐慌後，選擇進口替代工業化；而進口替代工業化在 1980 年代的債務問題出現後，又被「新自由主義」為原則的改革政策所取代。另外，在新自由主義看似有短期改革的效果後，為什麼這三個國家卻又分別在 1994 年（墨西哥披索危機）、1999 年（巴西通貨危機）、2001 年（阿根廷經濟危機）出現經濟危機。近年來，在債務問題依然嚴重的情況下，三個國家的社會結構出現什麼樣的問題，導致貧富差距加大，而經濟問題依舊存在。

拉美債務處理的時間相當長久，以 1982 年的債務危機算起也超過二十年，因此債務處理過程所持續的問題是本文所關心的。同時，拉美政府所信奉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價值也是本文所批判的立場。另外，究竟這三個國家對債務處理的狀況有何異同之處？而拉美國家究竟如何受到既有環境與決策束縛？為什麼國家政策會失靈？這些都是本文必須釐清之處。

---

<sup>4</sup>James Petras 指出拉美國家在 1970 年代，已由軍人獨裁政府導入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政策。在 1980 年代後，一連串的民營化的改革，拉美各國政府欲以企業民營化，調整國營企業以求債務調整。請參考江心學譯，Ronald Chalcote 著，2004，《替代拉美的新自由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3-16。

本文將分別討論各國政府在不同時期，面對當時的經濟危機，如何處理危機的措施與政策，以及各項調整措施與政策所帶來的影響，而改革後之狀況又如何使政府面對接下來衍生的經濟與社會問題。

## 貳、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方法採比較研究法，該研究方法是檢視各國的狀況，以一定的系統來作比較。此方法可以集中探討、比較各國某段或數段時期的異同。比較研究牽涉到國家選取以及如何進行比較的問題。在比較研究方法上，學者 Todd Landman 提出 most similar systems design（最具相似）與 most different systems design（最具相異）的比較研究方式。<sup>5</sup>前者指出選取的國家有許多變項相同，挑出一項不同的變項來作比較研究。而後者指出比較的國家中，各國許多的變項不同，挑出一樣相似的變項來做比較。本文採最具相異的方式，以“異中求同”的方式來做比較研究。

除最具相異的研究方式外，本論文預計以政治經濟學的領域範圍上，制度取向的研究途徑來作研究。所謂制度取向，是以政治經濟體內，各國家中的組織結構，將它視為經濟政策與經濟表現背後以最主要的因果因素。<sup>6</sup>制度取向的研究途徑以國家為單位，而本文研究的國家以墨西哥、巴西與阿根廷為主，以制度取向的研究途徑來比較這三個國家。

本文研究方法步驟：

1. 搜集拉美三國 1930 年代前的發展背景資料，了解世界經濟大恐慌以及進口替代工業化的政策，至 2004 年債務發展狀況的文

---

<sup>5</sup>周志杰譯，Todd Landman 著，2002，《比較政治的議題與途徑》。台北：韋伯文化，頁 15。

<sup>6</sup>蘇子喬譯，Mark Irving Lichbach, Alan S. Zuckerman 著，2005，《比較政治》。台北：五南，頁 242。

獻。了解墨西哥、巴西與阿根廷，在八零年代的外債危機爆發前，其原因與背景相關資料。

2.了解債務危機爆發後，各國政府因應策略與其成效不彰之原因，並探討一九九零年代以後全球性的第三波民主化之中，對各國債務有什麼樣影響。

3.由歷史的發展脈絡中，觀看各拉美政府領導人，特別是總統制的這三個國家，領導人如何面對債務危機。

4.了解三國債務狀況後，進一步比較三國發展狀況並提出債務改革方向之建言。

### 第三節 文獻探討與相關理論

#### 壹、文獻探討

在 Richard Leone 主編的《In The Shadow of The Debt - Emerging Issues in Latin American》一書中，對拉美國家債務情況作出分析。<sup>7</sup>不論是 Luis Rubio 談論的墨西哥，Marcílio Marques Moreira 批評巴西深受債務困境發展，Roberto Bouzas 提出阿根廷的改革方向，均提出債務如何影響並阻礙拉美國家的發展。不過本書的篇幅只限於 1990 年以前的拉美情況，對於民主化過後的拉美國家，近幾年的發展實有補充說明之需要。

Robert Kaufman 於《The Politics of Debt in Argentina, Brazil, and Mexico》一書中，針對拉美三大國家債務與經濟穩定關係作出論述，不但談論經濟改革，並論述改革能避免舊有的軍人政治現象再度主導三國政治。<sup>8</sup>但本書僅關注債務與經濟發展關係，對於後來的社會動蕩與貧富差距並無解釋。

George Potter 在《Deeper than Debt》一書所說的債務赦免與國際非政府組織的方式進行債務處理。<sup>9</sup>書中強調債務問題歷史性發展因素以及國際債權方（債權人、債權銀行與債權國家）應負之責任，不能單獨苛責拉美國家；並舉出 Jubilee 2000 計劃改善拉美國家因債務受到的人權危害。<sup>10</sup>雖然該書從政治、經濟與社

---

<sup>7</sup>Richard Leone, 1992, *In The Shadow of The Debt-Emerging Issues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Press.

<sup>8</sup>Robert Kaufman, 1988, *The Politics of Debt in Argentina, Brazil, and Mexico*.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up>9</sup>George Potter, 2000, *Deeper than Deb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or*. London: Latin America Bureau.

<sup>10</sup> Jubilee2000 指的是對債務國關懷的債務處理計劃。因應千禧年到來，以宗教觀念「重生」的想法，希望給重債國有機會重新發展機會。以此為基礎，將債權國也列入考量，強調債務不只債務國問題，也是債務國問題。各債務國也不能因債務而放棄政治自決與經濟獨立的權力。Ibid, pp. 129-130.



會面分析，且出版時間於 2000 年，但該書作者過於強調道德面向，因此忽略了經濟的現實面。

至於美洲開發銀行之官方出版品方面，《Living With Debt》一書將拉美所有國家的債務情況作出介紹。該書把近年來拉美國家債務問題重新補充，補足自 1982 年後債務危機文獻之不足。<sup>11</sup>雖然該書補充近年來討論拉美債務問題的狀況，但只偏重經濟因素與數據，無法了解債務對拉美國家的負面影響；而且該書只以總體經濟面討論，若將拉美政府視為個體，並無法了解拉美政府身為債務處理的行為者，各政府對債務處理之作為，其背後考慮的因素為何？

中文文獻中，大陸學者張寶宇等人著作《拉丁美洲外債簡論》針對外債危機爆發後，1980 年代十年左右的改革，對主要拉美國家一一討論，並分析了國際金融機構的援助。<sup>12</sup>但該書偏重經濟資料與數據的介紹，而且該書於 1993 年出版，對於二十一世紀的債務狀況無法討論。

綜合以上所述，本文除了討論國際因素對拉美債務影響外，並加上拉美各國政府處理的狀況加以研究。另外，國內雖有談論國際債務問題或拉丁美洲研究的論文期刊與書籍，但由於未有針對阿根廷、巴西與墨西哥國內情況加以比較分析，因此撰寫本文。

## 貳、相關理論

普勞維什(Raul Prebisch)認為拉美發展受挫由於西方工業國

---

<sup>11</sup>Eduardo Borensztein, Eduardo Yeyati and Ugo Panizza, 2006, *Living with Debt- How to limit the Risks of Sovereign Finance*. Washington, DC: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sup>12</sup>張寶宇、周子勤與呂銀春，1993，《拉丁美洲外債簡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家（中心）與拉美國家（外圍）發展關係上的不平等，以及「中心」國家對拉美國家之剝削。<sup>13</sup>這樣的論點在普勞維什於 1949 年發表《拉丁美洲經濟發展及其主要問題》一文後，被稱做「普勞維什命題」。他以歷史階段的論述，說明拉美國家的經濟受霸權國家的剝削，並論斷這樣的不平等關係。

而華勒斯坦(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理論則以「核心」、「邊陲」與「半邊陲」國家的分類說明第三世界國家發展上的不平等。<sup>14</sup>而華勒斯坦指出拉美國家就是國際體系中的「邊陲」國家，經濟發展受到核心國家剝削。

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的派別複雜繁多，但仍與中心—外圍論所關心的焦點類似，談論拉美國家發展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代表的學者有 A. Frank 與 Fernando Cardoso 等。<sup>15</sup>這一類型的解釋是站在第三世界受帝國主義的影響。<sup>16</sup>其中 Fernando Cardoso 依賴理論的提出，解釋了拉美發展受制於國際體系發展的淵源與結構。<sup>17</sup>

在 1982 年債務危機發生後，國際金融機構為處理相關債務問題，由世界銀行經濟學者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提出《華盛頓共識》，針對相關債務進行改革措施。<sup>18</sup>《華盛頓共識》10 點的措施作為，就是自由化、民營化與市場導向的改革。而這樣的方針，就是在拉美債務改革時進行的新自由主義思想。

---

<sup>13</sup> 郝名瑋與徐世澄，2008，《拉丁美洲文明》。福建：福建教育，頁 244-245。

<sup>14</sup> Stein Larsen, 2005, *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p. 594-612.

<sup>15</sup> Ibid, pp. 575-593

<sup>16</sup> 同註 13，頁 248-249。

<sup>17</sup> Marjory Urquidi, 1979,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up>18</sup> 張才國，2007，《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北京：中央編譯，頁 164-165。

中心與外圍理論的建立從國際體系分析，將世界分為「邊陲」、「半邊陲」與「核心」等國家集團，將世界中核心國家之發展是因為剝削其他國家而加以批判。Fernando Cardoso 等學者以依賴理論批評核心國家之作為，也是依循類似的發展脈絡。而拉美國家在此框架中，因為被剝削，形成不平等與落後的發展。直到 1982 年的債務危機爆發，拉美國家的社會衝突加劇惡化，因此後來的經濟改革循新自由主義的改革脈絡進行。然而，由於社會不平等、經濟結構與政治政策的限制，拉美國家即使在新自由主義的改革下，依舊是債台高築。

以上理論點出拉美債務問題受國際環境與既有的世界經濟結構限制，解釋了拉美債務問題原因，並著重於國際體系對拉美各國政府債務問題的影響。然而，現有研究專注於國際環境對拉美債務影響，本研究將國際因素與拉美三國政府處理方式一併討論。因此，本文以國家取向研究途徑與依賴理論，了解拉美國家主導下的債務處理，問題如何持續惡化下去？除了國際環境，並以統合主義解釋拉美非民主時期威權政府之影響，拉美各國政府如何處理債務；而民主化後，受到國際環境限制，債券問題符合 Fernando Cardoso 等人所提出的依賴理論限制，債務金額持續升高。

## 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 壹、研究架構

圖 1-1 為本文分析架構圖，以債務問題為核心，在「非民主時代之債務處理」，舉債發展使債台高築，為回應民主化後人民之壓力，政府欲發展經濟改善貧富差距，卻促成 1982 年債務危機之爆發。至於 1980 年代民主化的興起，導致三國政府為了選票持續執政以回應人民要求，依新自由主義的改革脈絡回應。不過，仍以舉借債務為手段。

債務流向有兩方面：一方面債務因新自由主義改革策略，使資金流向資本地主等資產階級；另一方面舉借債務為基層人民的生活與社會政策而支出。但是貧富差距更加擴大，引發更多的社會運動，造成社會動蕩不安，政府不得不飲鴆止渴地又回到老政策再舉借債務，造成債台高築無法脫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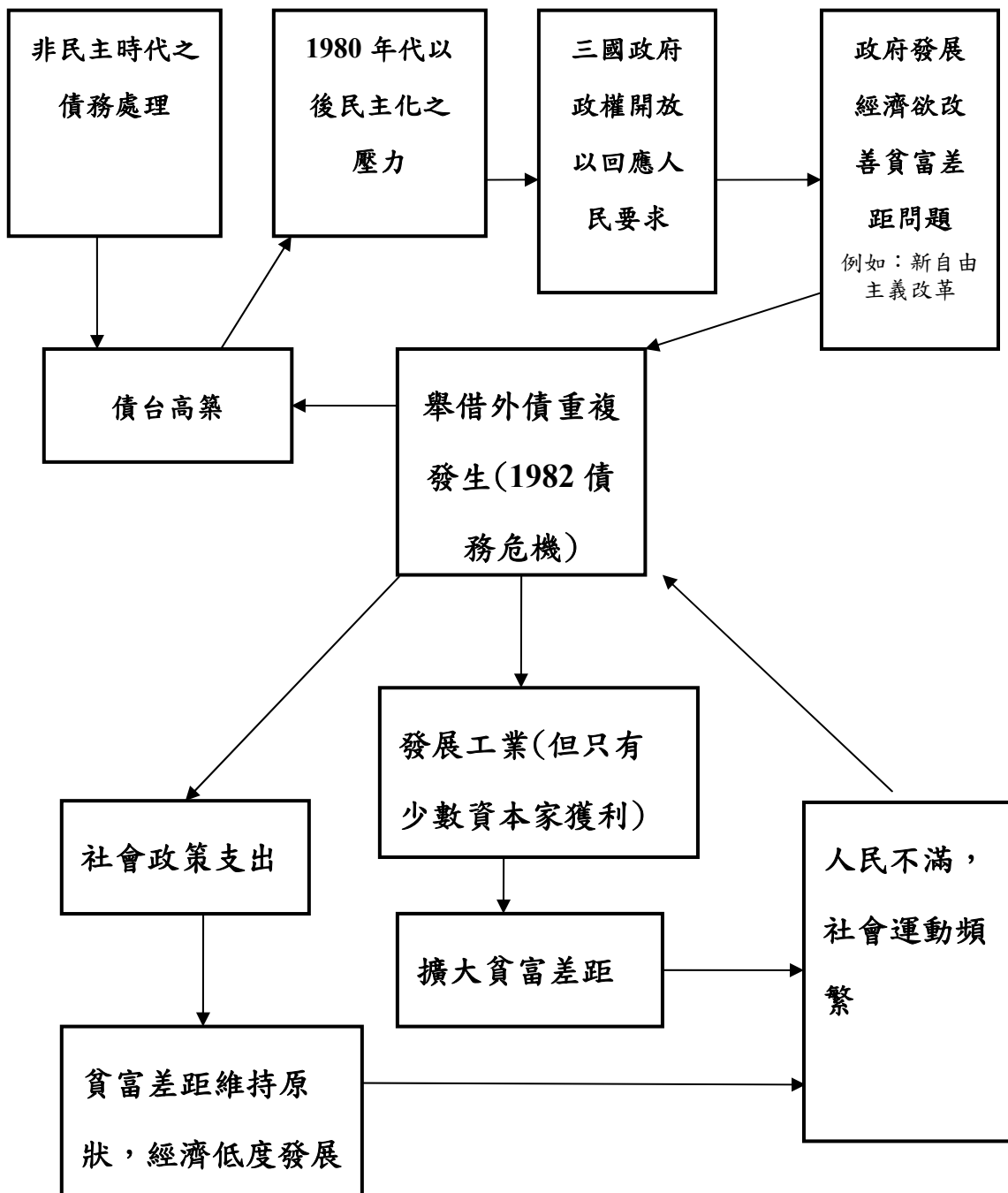


圖 1-1：研究架構。

圖 1-2 說明墨西哥從 1929 年由革命制度黨執政後，國家發展由革命制度黨所控制，債務問題也與革命制度黨內歷任總統態度息息相關。1940 年後由卡馬喬總統(Manuel Camacho, 執政任期 1940 年-1946 年)持續進行進口替代工業化，此時債務開始積累。

1980 年代開始，墨西哥由於國際利率升高與國際油價問題，使得債務問題惡化。經過德·拉·馬德里總統 (De La Madrid, 總統任期 1982 年至 1988 年) 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欲改善債台高築問題並縮小貧富差距問題。

一方面由於 1980 年代後的選舉，革命制度黨在國會席次逐漸減少，使統治基礎受到動搖。因此政府推出社會政策欲改善貧困家庭的生活。此外，並投入資本發展工業。但以上兩種策略造成的貧富差距卻持續擴大。

到了 1994 年由塞迪約當選總統 (Ernesto Zedillo, 任期至 2000 年)，同年卻爆發恰帕斯農民運動，突顯貧富差距的問題惡化。為處理人民不滿，只能再舉借債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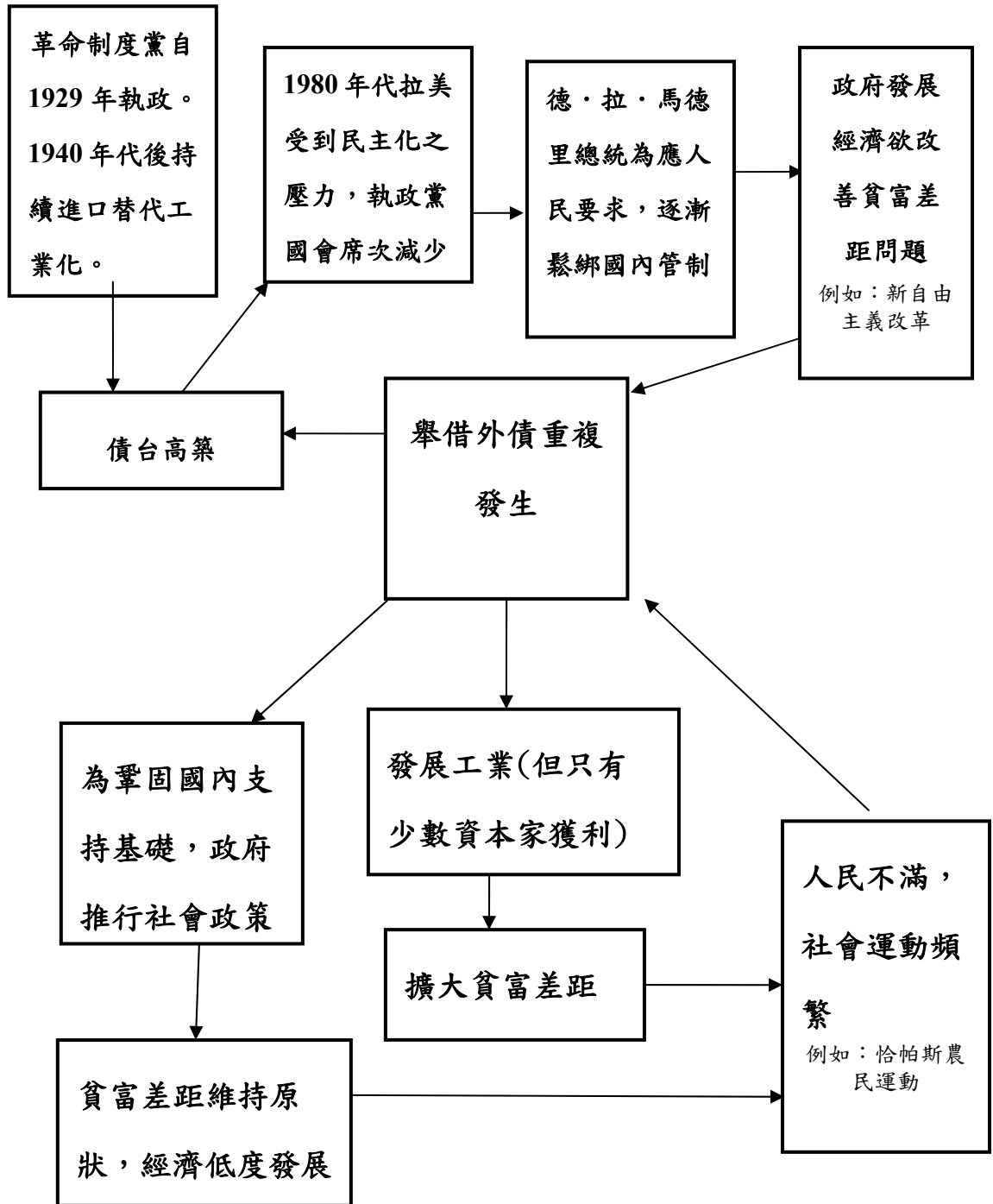


圖 1-2：墨西哥研究架構。

圖 1-3 說明巴西大致上債務發展框架。循著相似脈絡，在 1964 年軍政府政變以前，1930 年瓦加斯(Vargas)革命以來，行使進口替代策略，接著 1964 年至 1985 年進入軍政府執政。簡言之，1985 年民主化以前由軍政府的「負債發展」策略進行債務積累。

1982 年後由於債務危機使債台高築，1985 年巴西進入民主化。民主選舉過程中，贏得選舉的總統為回應民意，必須兌現競選政見並致力於經濟發展。

然而，民主化後持續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並未改善貧困家庭的經濟狀況。巴西資本家的財富持續增加，形成貧富差距拉大，巴西的經濟貧富差距惡化乃拉美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因此巴西國內造成社會運動，反映出民心之不滿，例如無地農民運動。由圖 1-3 的說明可以發現，巴西債務同墨西哥，進入一種相似的循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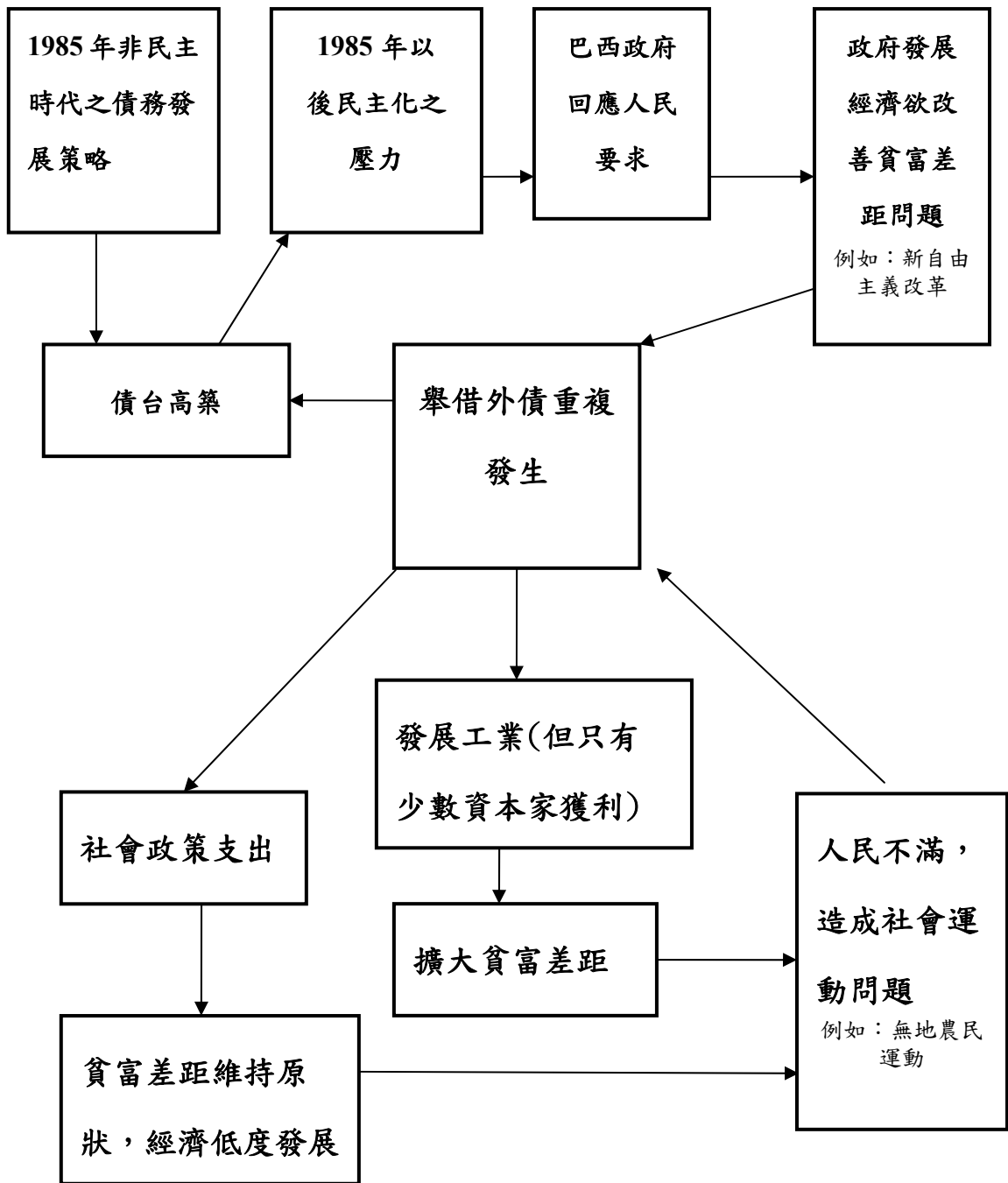


圖 1-3：巴西研究架構。

圖 1-4 說明阿根廷債務發展與問題。在軍方勢力深深影響阿根廷的政治發展，使得軍人角色在阿根廷政壇顯得重要。自 1983 年福克蘭戰爭失敗後，造成阿根廷軍方影響力與威信降低。負債發展下債台高築使阿根廷進入民主化。

阿方辛(Raúl Ricardo Alfonsín, 總統在位期間 1983 年~1989 年)總統接替軍政府執政，激進傾向的阿方辛不遵循前軍人政治之政策方向，以新自由主義為改革方式。但阿方辛也得面對債務持續的增加問題。

自 1989 年阿方辛辭職，將總統直接交予新民主黨總統梅內姆(Menem, 於 1995 連任總統，1999 年辭去總統)，梅內姆也採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發展。但從圖 1-4 可知，步上墨西哥與巴西兩國同樣的債務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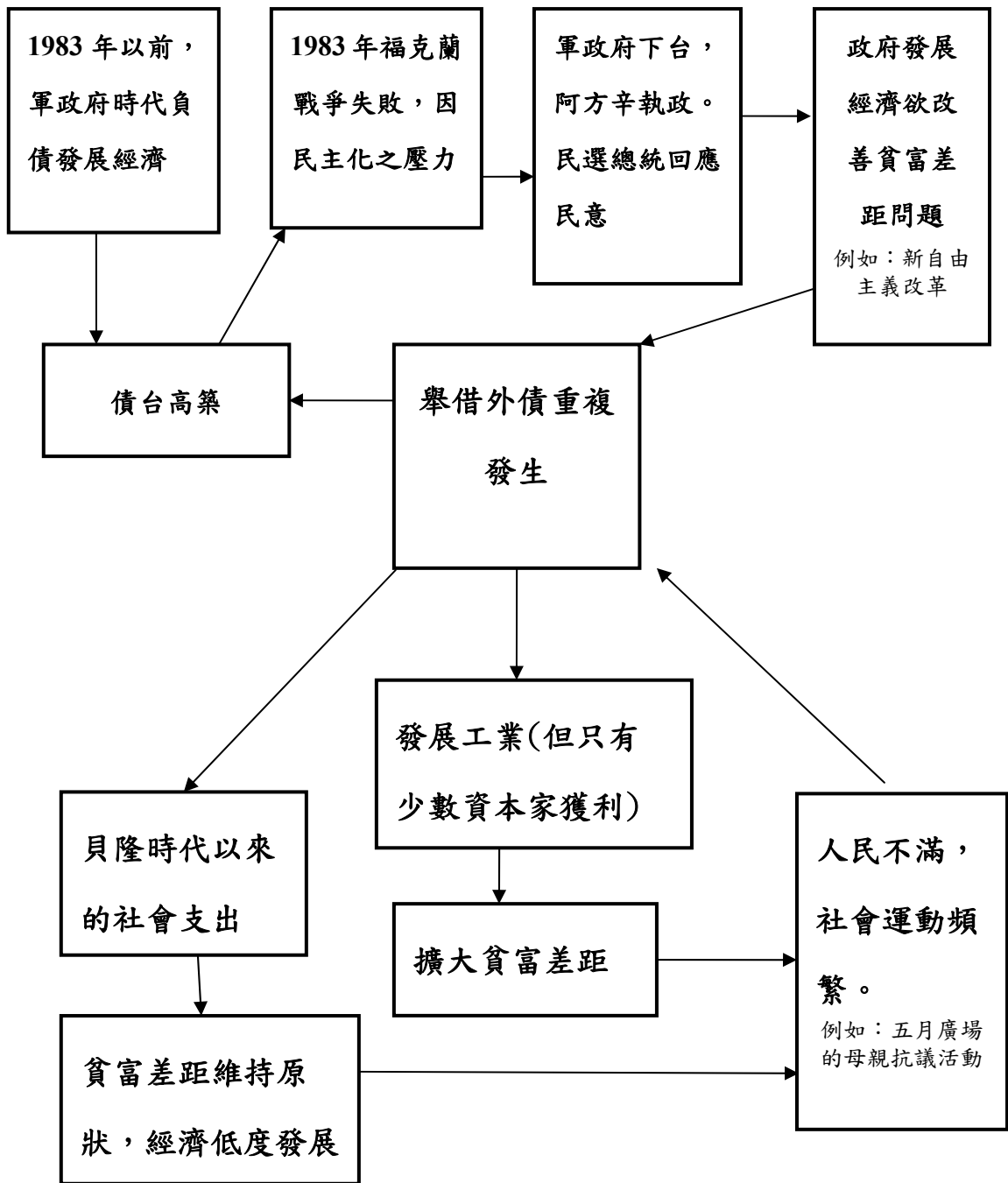


圖 1-4：阿根廷研究架構。

## 貳、拉美三國歷任政府大事紀

本文研究拉美三國，並從 1930 年代經濟大恐慌開始，談到二十一世紀的債務發展，其牽涉範圍廣大。為說明本文三國的債務發展史，特別以表 1-1 說明三國債務發展。

表 1-1：拉美三國重大歷史事件表

國別(歷任總統)	墨西哥	巴西	阿根廷
時間			
1929 年起	世界經濟大恐慌：1930 年代起，三國行進口替代工業化政策。		
1930 年		1930 年起，政治瓦加斯總統專政	烏里布魯將軍政變
1934 年	卡德納斯：進口替代工業化		1932-1938 年：胡斯托贏得總統
1943 年			貝隆政變上台。1945 年被補，同年被釋放
1945 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1949 年	阿根廷學者普勞維什提出「發展主義」，欲使拉美各國擺脫經濟上，資本長期依賴外資。		
1946 年	二戰後，總	杜特拉總	貝隆獲釋

	統阿雷曼 上台	統上台	後，當選總 統
1951 年		瓦加斯透 過選舉重 返總統職 位	貝隆連任總 統
1954 年	魯伊司克 提內斯：持 續的進口 替代與穩 定發展	1955 年，庫 比契克總 統上台	1955 年貝隆 因政變流亡 海外
1964 年 -1970 年	迪亞斯奧 爾達斯總 統：經濟奇 蹟發展	1964 年軍 政府政變	1958 年佛郎 迪西將軍當 選總統。 1962 年因政 變下台。 1963 年伊利 亞當選總 統。
1970 年	新自由主義改革		
1970 年 -1979 年	埃切維里 亞與波提 約：負債發 展石油工 業	1968-1973 年：經濟奇 蹟	1966 年、 1970 年、 1971 年多次 政變。1973 年貝隆返國 當選總統。 1974 年貝隆

			去世，貝隆總統夫人繼任。1976年又軍事政變。
1980年	新自由主義改革持續推展		
1982年	拉美債務危機發生		
1982年	德拉馬德里總統：接受新自由主義改革		阿根廷福克蘭戰爭失敗，軍政府下台。
1983年			軍政府兵敗福克蘭群島而下台，阿方辛以民主選舉方式當選總統
1985年		巴西軍政府下台	
1988年	薩利納斯總統上台		1987年，多次軍事政變失敗。
1989年		巴西人民直選總統	梅內姆上台
1990年以後	拉美國家進入民主化浪潮，除古巴外皆有民主選舉		
1994年	塞提約總	1992年科	1995年梅內

	統就任： NAFTA 生效運作、恰帕斯農民運動與披索危機同年發生。	洛爾下台，佛朗哥下台。1995 卡多佐上台。1998 年連任。	姆連任
1999 年		巴西經濟危機	德拉魯阿當選總統
2000 年	政黨輪替：國家行動黨總統福克斯上台		2001 年因經濟危機，更換三任總統
2002 年		左派總統：勞工黨魯拉上台	2003 年正義黨基什內爾當選總統
2004 年	債務問題依舊存在		
2006 年	國家行動黨候選人卡爾德龍當選總統，但爆發選舉爭議		
2007 年		魯拉連任	基什內爾夫人當選總統

本表說明三國債務發展狀況，特別要注意幾個重要的時間點：

首先，1929 世界經濟大恐慌，造成了拉美各國家進行進口替代工業化政策。其次，二次大戰結束後，普勞維什提出經濟「發展主義」思想，欲使拉美各國擺脫債務問題。復次，1970 年，國際開始向拉美國家導入新自由主義思想，此時國際熱錢湧入拉美，有利拉美政府籌措發展經濟之資本。再者，1980 年代開始，國際利率與石油價格問題造成債務危機；新自由主義改革持續進行。最後到了 1990 年代，拉美進入民主化。

拉美因債務問題進入了民主化，而民主化下的拉美各國，其債務政策開始受到民意影響。換言之，民主化前後對拉美債務問題處理最大差別在於：民意影響政策。

債務政策受到民意影響，異於民主化之前的狀況，拉美債務問題的發展開始受到監督。從 1990 年代民主化到 2000 年以後，債務雖然惡化，但民意的影響已使債務問題處理異於民主化之前。



## 參、論文章節安排

本文題目排序為阿根廷、巴西與墨西哥，乃以三國英文國名之字母排列順序。而本文架構從墨西哥談起，是因為拉美債務問題，首先墨西哥於 1982 年 8 月宣布債務停止償還，同年底巴西宣佈停止償還，再到阿根廷。論文題目中三國排名順序與論文內文架構上因而不同。本文以「時間」為各章的分界，社會、經濟與政治結構因素為每個單章的分析變項，比較三個國家的債務問題與經濟發展。

第一章為緒論：包含本文的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架構與研究方法、論文章節安排、文獻分析。

第二章討論拉丁美洲外債問題之歷史背景。本章描述產生拉丁美洲舉債之緣由：從 1930 年代左右的世界經濟大恐慌開始，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說明拉美三個國家如何造成債務的累積。

第三章討論內容的時間是從二次大戰後至 1982 年債務危機之爆發。這段期間造成拉美外債的原因，主要是「負債發展」為三國政府主要的經濟發展方式，因而債務金額持續升高。當國際經濟情勢變動、國際利率升高再加上國內資金不足時，拉美國家債務金額短期內急速增加，陷入無法償還債務的窘境，爆發債務危機。

第四章討論三國政府在 1982 年後十年的債務處理狀況。三個國家在 1980 年代的改革被美洲開發銀行視為失落的十年，究竟債務改革問題出在哪裡？當人民普遍對政府債務處理不滿，舊有的

政治結構又未能處理好 1982 年的債務問題，再加上第三波民主化的影響，拉美國家開始出現重大轉折。

第五章論述自 1990 年代以來，拉美三個國家在新自由主義的改革後，仍舊債台高築之狀況。即使進入二十一世紀，三國發展受債務金額負面影響仍舊存在：阿根廷透過談判改善債務，但未增加國家實質償債能力；墨西哥雖有債務降低效果但不如阿根廷；巴西始終改革效果不彰。因此，本章分析民主化後的三個國家對債務問題的處理，究竟是什麼因素使得債務問題處理上效果不足。

第六章為結論，總結拉美債務問題處理的狀況與解決債務的手段，最後以拉美債務問題前車之鑑提出建議。

## 第二章 1929 年-1945 年：經濟大恐慌至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拉美發展

拉美國家由於十九世紀獨立戰爭時期的資源消耗，以及戰後未能迅速累積資本，因此在擺脫西方先進國家的殖民之後，必須仰賴其他國家資本與舉借債務，這是拉美國家債務問題的起源。

### 第一節 墨西哥：從迪亞茲到革命制度黨統治

自獨立戰後，墨西哥政治未能穩定發展。就總統執政而言，1824 年至 1848 年發動多達兩百五十多次軍事判亂，更換了三十一位總統。<sup>19</sup>經過自 1858 年至 1860 年三年的國家內戰，胡爾雷斯(Benito Pablo Juarez)成為首位印第安人總統。此時期雖受到法國路易拿破崙的干政，但 1872 年再度當選總統。則胡爾雷斯於 1872 年過世，繼任總統的雷多(S. Lerdo de Tejada)則表現不佳。在美國支持下，迪亞茲 (Porfirio Díaz, 1876 年至 1911 年執政) 上台執政。

---

<sup>19</sup>何國世，2003，《墨西哥史—仙人掌王國》。台北：三民，頁 79。

迪亞茲專政三十五年期間，墨西哥在籌措資金的策略進一步擴張，仰賴外資與外債。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因經濟大恐慌緣故，國民革命黨上台執政，而後改組成為革命制度黨。該黨統治下的墨西哥，比起其它拉美國家，相對上算是穩定。在革命制度黨一黨統治下，國家不受軍人政變影響。革命制度黨統治墨西哥，直到 2000 年才由國家行動黨透過民主選舉完成政黨輪替。

1910 年的革命運動推翻了迪亞茲政權，革命後的墨西哥社會結構與十九世紀相比，社會階級產生了變化：從地主、軍閥與官僚買辦階級為核心的社會結構，轉變成以資產階級為核心的社會結構。<sup>20</sup>換句話說，革命後的墨西哥仍然保有社會階級的差距，只不過由新的階級取代舊的階級。

墨西哥在迪亞茲執政三十五年間，雖然經濟發展持續提升，但財富分配持續聚集於少數人之手。社會結構在 1910 年的革命後，仍保有「階級」的概念。往後墨西哥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的發展，深深地受到「階級」的影響。即使在 1917 年新憲法制定實行、1929 年國民革命黨（革命制度黨前身）上台執政，這樣的「階級」影響在二十世紀的墨西哥，全面性的影響社會、經濟與政治發展，而這時期的資產「階級」也就是布爾喬亞。<sup>21</sup>

革命制度黨因為一直主政，墨西哥的發展問題在 1911 年迪亞茲政權被推翻後，相對其他拉美國家較為單純。經過 18 年的民主選舉與發展，革命制度黨於 1929 年開始統治。該黨維持了 71 年的一黨統治並決定了墨西哥的發展策略。

---

<sup>20</sup>陸國俊、金計初，1997，《拉丁美洲資本主義發展》。北京：人民出版社，頁 79。

<sup>21</sup>徐韻媛，2006，〈布爾喬亞對社會文化發展之影響—以墨西哥為例〉，碩士論文，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頁 38-45。

由於沒有被輪替的可能，革命制度黨的執政壓力低。從 1930 年代經濟大恐慌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革命制度黨的執政策略是一方面穩定國內情勢，另一方面遵循過往的經驗以舉借外債發展經濟。在世界經濟大恐慌之前，墨西哥為求經濟發展，在資本不足的情況下，除了保有與殖民母國西班牙的經濟合作關係外，為增加資本的籌措，發展經濟必須向其他國家舉債。世界經濟大恐慌發生後，經濟策略轉變為「進口替代工業化」的發展政策，全面穩定國內經濟與政治情勢。<sup>22</sup>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這樣的經濟發展主軸仍舊影響著墨西哥。

1930 年代後至二次大戰結束，墨西哥的社會結構受到「階級」影響，經濟結構財富分配不均。但在革命制度黨（1938 年改名）的統治下，此時期是穩定的，革命制度黨能針對勞工制定政策，滿足基層人民需要。同時，革命制度黨修正迪亞茲時期依賴外資發展的政策，將石油公司收歸國有。不但在經濟上取得利益，在政治上建立民眾信心，獲得人民支持。石油經濟象徵墨西哥國家命脈，將其國有化策略，雖與外國公司產生衝突，但深受國內人民支持。迪亞茲專政時期投入的外資，持續促進其經濟現代化的發展，特別是石油工業，最後經濟發展由革命制度黨政府收割。<sup>23</sup>

墨西哥自 1826 年獨立以來到 1930 年經濟恐慌，國內經濟始終依賴殖民母國與外國資本。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革命制度黨為擺脫國際市場依賴與限制，採行了進口替代的策略。

---

<sup>22</sup>進口替代工業化，(Im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 縮寫 ISI)。意謂國內製品替代國外的進口製品。

<sup>23</sup>郝名瑋、馮秀文與錢明德，1998，《外國資本與拉丁美洲國家的發展——歷史沿革的考察》。北京：東方出版社，頁 88-90。

## 第二節 巴西：帝制、共和與瓦加斯

巴西在 1822 年獨立之後行君主立憲，在 1889 年進入共和國時期至 1930 年，稱為第一共和或舊共和時期。因 1929 年的經濟大恐慌使瓦加斯發動革命，巴西進入現代化工業化，也同時進入了政治現代化。<sup>24</sup>1930 年代的世界經濟大恐慌與瓦加斯革命，也使得巴西經濟進入進口替代時期，而政治上由新興資產階級替代舊有的農業寡頭集團來進行統治。<sup>25</sup>

1930 年瓦加斯首次擔任巴西總統，其個人意志與軍人勢力的結合，可說是這時候巴西政治運作的主要兩種動力。由於「高地酋主義」在拉美政治有著深遠的影響力，而這些優秀軍人掌握武力資源與知識，輕而易舉毀損了巴西的民主。<sup>26</sup>例如瓦加斯在 1934 年當選總統，在 1938 年新任總統選舉來臨前，在 1937 年瓦加斯與其軍人勢力掀起自我政變，以新國家(Estado Novo)政治主義推翻新憲，持續瓦加斯的總統任期。<sup>27</sup>而這樣的新國家主義，深深影響巴西政治達八年之久(1937-1945)。在少數的資產階級支持下，瓦加斯進行了 15 年的強人統治。而二次大戰結束後瓦加斯因國內民主化壓力，被要求下台，此時巴西重新進入民主政治選舉的時期。

世界經濟大恐慌使巴西發展受到影響，1930 年上台執政的瓦

---

<sup>24</sup>張寶宇，2002，《巴西現代化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171-172。

<sup>25</sup>在 1930 年之前，巴西社會中已存在著所謂的農業寡頭階級。呂銀春、周俊南，2003，《列國志：巴西》。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98-99。

<sup>26</sup>高地酋(Gaudillo)指的是拉美國家十九世紀獨立時代以來，軍人干政影響政權的發展，所形成的政治發展現象。高地酋的歷史脈絡，請參考湯世鑄，1996，《拉丁美洲軍人政權之研究》。台北縣：知書房，頁 43-74。

<sup>27</sup>何國世，2003，《巴西史-森巴王國》。台北：三民，頁 125。

加斯總統，為了擺脫世界經濟危機對巴西的影響，進行了進口替代的策略。巴西因歷史結構因素，使社會結構有少數的資產階級。巴西從 1930 年瓦加斯執政至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這段時期國家經濟的發展始終仰賴外資。換言之，國家自獨立十九世紀獨立以來，外國資金深深地影響巴西經濟。而這種依賴關係，在 1930 年代經濟大恐慌時因世界性的衰退，使國外至巴西的進口量減少，換言之，巴西的市場發展由於從國外機器設備的進口不足，所以巴西同其他拉美國家實行進口替代工業化。<sup>28</sup>

原本的農業寡頭在社會結構上是擁有資產的少數地主，可視為一種舊時代的資產階級，擁有國家經濟分配上的多數財富。取代了他們的新興資產階級，在經濟結構上也掌握財富；而這些新興資產階級受到瓦加斯政府經濟政策的影響，舉借外資投入國家發展。1930 年的總統選舉，由於擁護瓦加斯的軍人不滿，引起了革命，推翻了選舉結果。另外，新興的資產階級取代原有農業寡頭階級的地位。在瓦加斯及其勢力革命後，巴西社會雖進入現代化，但仍保有十九世紀帝國時期的社會結構不平等。

在 1940 年代以後，巴西國內的工業因借助外國資金與技術開始發展。也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世界先進國家的經濟發展有限而巴西因戰時經濟發展，開始進行國家現代化經濟進程。整體而言，巴西經濟深受國家干預，採行瓦加斯主導的國家發展政策。

瓦加斯第一次執政從 1930 年維持到 1945 年。在 1930 年後，瓦加斯為了隔離世界經濟大恐慌對巴西的不良影響，行使進口替代工業化，加強了巴西國內市場的保護策略。此外，巴西國內也

---

<sup>28</sup>同前註，頁 128-129。

進入了工業化的發展，而資金來源方面則是依賴外國資本的投入。<sup>29</sup>而農業寡頭階級被資產階級取代，社會結構上仍有少數財富階級與貧窮基層階級的問題。執政的瓦加斯總統面臨世界經濟不景氣，選擇進口替代工業化的策略，雖奠定巴西進入現代國家工業化的基礎，但也因為進口替代政策影響社會結構，形成 1982 年的債務危機發生，如此的社會結構進一步使債務問題惡化。

### 第三節 阿根廷：軍人干預與國家發展

阿根廷從 1816 年正式獨立後，採自由貿易的策略，因此開放外國資本進入阿根廷。阿根廷這種開放的策略，也造就大量移民的進入。到了二十世紀初，受工業發展與工人運動影響，歐洲的社會主義思想與相關的活動在阿根廷國內展開。<sup>30</sup>因此，此時期的阿根廷物價不穩定與工人生活惡化，工人只能以罷工的行為與資產階級對抗。

獨立後的一百年，阿根廷發展過程呈現兩種階段：國家經濟、社會結構的變革與政治權勢的移轉階段(1810-1862)與國家經濟發展階段(1862-1914)。在第一個階段，這些移民的進入，改變了阿根廷國內的人口結構，也改變社會結構。這些帶來資金的移民，如同阿根廷原有的地主階級，也與其他拉美國家的地主一般，掌握阿根廷國內社會的財富。<sup>31</sup>

1914 年之前阿根廷國內持續吸引大量的移民，這樣的情況下，使得阿根廷與世界的經濟關係更加休戚與共。直到 1930 年代

---

<sup>29</sup>同註 23，頁 140-144。

<sup>30</sup>宋曉平，2005，《列國志：阿根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67-69。

<sup>31</sup>同註 23，頁 179-180。



的世界經濟大恐慌，使得阿根廷國內要求改革的聲浪增高。除了同拉美其它國家行使進口替代工業化，也使得國內興起一股民眾主義的風潮，造就 1946 年貝隆的上台。貝隆雖然已經去世，但其創立的正義黨至今影響著阿根廷政壇的發展。而進口替代的發展策略，使得阿根廷同其他拉美國家，進入債務危機的泥沼當中。

從工人、移民、資產階級等變遷因素，加上世界經濟大恐慌惡化了阿根廷國內的社會環境，造成阿根廷國家整體的衰退。由於農牧出口產品對外市場萎縮，使得阿根廷的發展策略行使進口替代。而國內製造業的成長使得農村人口湧向城市，使得原有的農業社會產生改變；加上阿根廷的土地分配同其他拉美國家的歷史背景，大部份土地掌握於少數資產地主階級，因此加大社會差距，更惡化了農村人口遷移的都市的情形。<sup>32</sup>

在政治方面不同於墨西哥在 1940 年代後就無軍人干政或政變之問題，巴西與阿根廷都受到軍人政變與統治的遭遇，阿根廷的程度甚至於超過巴西。<sup>33</sup>自 1810 年獨立以來，阿根廷政治結構上脫不了軍隊干政的問題。1930 年時烏里布魯(José Félix Uriburu)趁世界經濟大恐慌時，發動阿根廷二十世紀首次軍事政變推翻了伊里戈延(Yrigoyen)總統。

伊里戈延總統受經濟情況惡化，不但失去支持基礎，也使得政治上的反對勢力，即保守派（資產階級）的政變成功，發動軍事行動推翻政府。隨後烏里布魯在 1931 年的總統選舉敗選，使得政權進到胡斯托(Agustín Pedro Justo, 任期 1932 年~1938 年)的手

---

<sup>32</sup>何國世，2007，《阿根廷史—探戈的故鄉》。台北：三民，頁 147-151。

<sup>33</sup>同註 26，頁 98-99。阿根廷在拉美 20 個國家中排名第三，超越墨西哥與巴西，因此阿根廷的政治深受軍人影響，特別是 1943 年後的貝隆(Juan Domingo Perón)。

中。在 1946 年二戰結束、貝隆上台前，阿根廷國內以「民眾主義」為政治主流。<sup>34</sup>「民粹主義」的政治意識型態，最後在 1946 年貝隆上台後，整合並轉變成一種不同於自由主義或共產主義的路線，稱為「正義主義」。而貝隆與「正義主義」對阿根廷在二戰後的影響極為深遠，甚至影響阿根廷的政治至今；阿根廷政壇上的正義黨就是因此而來。<sup>35</sup>另外，貝隆的正義主義也將阿根廷經濟帶向現代化國家的道路上。

阿根廷在 1930 至 1945 年間，先後經歷烏里武魯與貝隆的政變，加上選舉過程的舞弊以及投票權集中於少數的資產階級身上使得這個時期的阿根廷政治運作呈現倒退狀態，除了「高地酋」的政治文化外，也代表著 1890 年至 1930 年間建立的民主政治原則被破壞，使阿根廷呈現民主倒退之勢。

同樣與墨西哥和巴西受到 1930 年代世界經濟大恐慌的影響，阿根廷在這個時期轉向進口替代工業化的經濟發展策略。因此在經濟大恐慌影響下，國際市場對農牧產品需求減少，使阿根廷農牧產品出口受到影響，其產品價格在國際市場下降，農民生活困頓，也接連影響全體人民的生活品質。收入減少的阿根廷，使得國內鐵路運輸減少，商品流動減緩，進一步使中小型企業破產、城市失業人口上升，在 1932 年失業人數為 33.4 萬。<sup>36</sup>這樣的情形下，阿根廷的經濟發展方向開始朝工業化發展，可是進口替代工業化是當時不得不採取的策略。

---

<sup>34</sup>民眾主義(Populism)大致上有兩種支派，一種是經濟上的，要求將國外資產收為阿根廷國內所有；另一種是意識型態上極右派的思想，以下本文將民眾主義視為民粹主義。

<sup>35</sup>正義主義、民眾主義與民粹主義，本研究未加以細分，都視為政治人物回應選民，擴大民眾政治參與的一種方式。

<sup>36</sup>同註 20，頁 262。

由於民主倒退，政府施政不受監督，因此在政策選擇上，阿根廷政府為求增加出口，其政策一味地以刺激出口數額為主，未針對經濟結構改變作出根本性改革。因此，依賴外國資金與債務，為振興國內市場。持續的債務舉借，使國家財政負擔增加，影響了基層人民的稅賦負擔。<sup>37</sup>而阿根廷總統胡斯托(Agustín Pedro Justo Rolón, 1932年-1938年執政)因此緊縮國家工程開支與社會福利計劃，使人民基礎生活設施進一步惡化。接著繼任總統奧爾提茲(Ortiz, 1939年至1940年)由於健康問題將總統職權交由副總統卡斯帝略(Ramón S. Castillo Barrionuevo, 任期從1940年開始，至1943年被政變下台)。卡斯帝略沿用奧爾提茲的財政方針，並因應第二次世界大戰，將出口市場由原來的英國與歐陸市場，轉向美國市場。<sup>38</sup>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由於阿根廷的農牧出口萎縮，使得國家發展以進口替代工業化的方向進行。因此，由此時期可以看出阿根廷政府對經濟干預的情況相當全面。

阿根廷為躲避世界經濟大蕭條之影響，行進口替代的經濟策略。到1943年起，展開貝隆上台執政的正義主義路線，也是阿根廷政壇上正義黨前身貝隆黨的創立人，他這樣對外隔離的策略，不但使得阿根廷的國家經濟，從世界前十強，大幅退化成現在發展中國家的水準，接著阿根廷在接續的軍人政權中，受到「高地酋」的影響。雖然在政治意識形態上，阿根廷達到不受外來干預的獨立路線，但政治上軍人政變頻仍，甚至於罷免民選總統，行使恐怖統治，使得政治動蕩。另外，軍政府對外債持續舉借的發展政策，也使阿根廷這個曾在二十世紀初，為世界經濟一等的強國，在一百年後為債務問題而動亂。

---

<sup>37</sup>葉爾莫拉耶夫主編，北京翻譯社譯，1972，《阿根廷史綱》。北京：三聯書店，頁541-546。

<sup>38</sup>出口市場的變化，阿根廷也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情勢的考量，由歐陸轉向美國。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譯，Leslie Bethell主編，1991，《劍橋拉丁美洲史——第八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47。

## 第四節 三國比較分析

1930 年代受世界經濟大恐慌的影響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左右，這時期拉美國家受國際經濟情況負面影響，因此在經濟發展策略轉向進口替代。在當時其實有債務無法償還給債權銀行與債權國的「債務危機」；但這個時期的債務問題而言，影響層面不若 1982 年的債務危機。

這個時期對拉美國家發展，重要的意義在於因十九世紀的歷史結構因素，各國社會因土地聚集於少數地主，有著社會結構問題。而社會結構問題在 1930 年代的世界經濟大恐慌影響下，拉美國家經濟轉為進口替代工業化的發展方向，各國財產聚集於少數人，而人民普遍經濟狀況不佳，政治上又未有穩定的民主制度運作，使得人民只能聽從政府政策。

從本文研究目的分析，以政治、經濟與社會三層面討論發現本時期的拉美債務發展特色：

拉美三國就政治層面上，即使於十九世紀獨立後，政治發展仍未有穩定的民主政治。受社會結構的傳統因素，以及經濟上基層人民被資產階級與軍人政府的剝削，在政治上就是民主選舉權的未普及，欺騙舞弊的選舉過程，以及軍事政變的不斷出現。即使未有軍事政變的墨西哥，革命制度黨為求穩定統治的目標下，民主仍難以實行。

因此，三個國家的政治權力即使進入 1930 年至 1945 年，這期間除墨西哥外，依舊是民主政府與非民主政府相互交替，主要

由社會階層上的少數人掌握。這些人因為是經濟階層優勢並結合軍隊（墨西哥則由革命制度黨穩定統治），所以進而掌握政治權力，決定了國家發展方向，一般人民難以有決定權。

墨西哥到二戰結束後，國家政治由革命制度黨穩定掌控。巴西由於瓦加斯革命在 1930 年後進入非民主時期，在二戰結束後又恢復民選的政府。而阿根廷不若墨西哥穩定地受到一黨統治，同巴西受到軍人政權統治影響，甚至於軍人政治影響程度高過巴西，造成 1946 年的貝隆上台以及後續的軍人統治，這也是為什麼阿根廷軍人政治影響程度較大。<sup>39</sup>

在既有的社會結構上使經濟財富由少數人壟斷。而這些資產階級，由於掌握財富，因此經濟的發展也為他們所決定。經濟為求工業化與現代化，除了與政府掛勾，掌握選舉與政變的政治狀況，並且透過國家名義對外大量舉債，形成負債發展，因此爆發 1982 年的債務危機。

拉美三國就經濟層面上，由於社會結構變化不大，因此經濟方面的財富分布與十九世紀無異。十九世紀的經濟優勢階層與二十世紀二戰結束時的經濟優勢階層仍是由少數人掌握，加上拉美國家自十九世紀獨立戰爭以來依賴外資與外債的傳統，而各國國內一般基層人民收入有限，國家社會福利政策也不多，使得一般人民生活收入變化不大。最大變化是因經濟大恐慌而造成的進口替代工業化的發展策略。

進口替代工業化在經濟層面的考量，都是因為三個國家受制

---

<sup>39</sup>同註 26，頁 155-163。

於國際經濟大恐慌的影響，使得國際市場，特別是歐陸市場的萎縮。拉美三國由於這些工業化國家的市場萎縮，進而影響拉美三國本身的農牧產品的出口，進而影響景氣。

因此，為擺脫世界工業化國家經濟不景氣的影響，三個國家的政府決定採行進口替代工業化的策略。將國外經濟負面影響降至最小。進口替代工業化的策略也算是一種不得不選擇的方式。然而，進口替代的實行，由於拉美三國本身的工業化不足，工業基礎的建置有待拓展，因此從已工業化國家進口機器設備外，對資金不足的拉美三國而言，仍舊依賴國外挹注，不論是外資或舉借債務。

在拉美三國的情況，就形成非民主政府的政策，由少數資產階級與軍政府片面決定，即使是民選總統領政，也不受監督。因此不論三國行使民主政治與否，其經濟政策由於在野黨的監督與影響不足，未能真正的監督國家財政的運用。因此，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三國政府不受制約的「負債發展」經濟策略，造成1982年的拉丁美洲債務危機。

拉美三國就社會層面上，二次大戰結束前的三個國家，社會結構上與十九世紀時期相似。三國社會結構上，均有少數人掌握多數土地或財富的傾向。進入二十世紀，國家發展上的策略由這些少數人決定，因此依賴外資、進口替代與舉債發展依照少數資產階級決定。

三個國家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下以「資產階級」與「其他基層人民」作為社會兩大群體的結合。資產階級通常與軍隊合作，在墨西哥，由於革命制度黨一統社會各階層的意見，因此社會分歧

較少，社會較為穩定。在巴西，瓦加斯與資產階級合作，並穩定軍方勢力，就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其統治根基相當穩固。

相較之下，阿根廷社會呈現少數資產階級之間，與不同家族勢力聯合，造成 1930 年與 1943 年的軍事政變。比起墨西哥的革命制度黨與巴西的瓦加斯統治，阿根廷顯得動盪許多。然而，這三個國家的社會結構在非民主的政府控制下，社會階層大至上呈現十九世紀的樣貌。

拉美債務問題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就已存在，但由於金額不高且國際金融發展的緊密程度有限，因此拉美三個國家在二戰前國家發展還不受債務問題影響，甚至因為西歐國家陷於世界大戰而拉美三國有二戰時期的戰時經濟成長。這時期拉美國家發展最重要的是進口替代工業化的經濟策略。當拉美三國不接受國外進口品，而由國內本身的工業品替代，雖是以經濟大恐慌時期的經濟欲與國外切割，但由於進口替代，也使得拉美工業的競爭力在對外隔之下日益低落。







# 第三章 1945年-1982年：進口替代到1982年債務危機

## 第一節 墨西哥：首先發生債務危機

墨西哥自 1930 年代左右的進口替代工業化策略，還有負債發展的經濟方向，都是革命制度黨統治下的策略。國內雖於 1940 年代後由資產階級成為經濟與政治上的優勢勢力，但該黨長期統治墨西哥下能夠將墨西哥社會各階層的意見，吸納並予以安撫以致能維持長期統治。<sup>40</sup>但 1982 年的債務危機爆發，代表該黨長期的經濟策略發生問題，同時因國內外經濟環境的變動，使革命制度黨在既有結構下無法解決問題，以致國內開始不穩定，社會運動頻仍。<sup>41</sup>

革命制度黨從 1930 年代至 1950 年代剛開始執政的時期觀

---

<sup>40</sup>同註 21，頁 46-47。

<sup>41</sup>革命制度黨為處理經濟上人民不滿，進一步開放政治上限制，使得在野勢力參政。關於詳細政治演變，請參考蕭勇毅，2005，〈墨西哥政治變遷與外資發展之關係〉，碩士論文，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頁 77-81。即使政治上持續開放，墨西哥債務問題引發的政治改革與民主化浪潮卻勢不可擋。

之，已經步入現代國家的經濟發展模式。1940 年到 1958 年，已經走過經濟恐慌的時期，國民經濟所得年均增長率約為 5.8%。<sup>42</sup>進口替代工業化的功效，使得墨西哥的經濟所得在 1940 至 1980 年，年均增長率約為 6%，工業的增長達到大約 7%。<sup>43</sup>1940 年代以後，墨西哥政府行使保護的貿易主義，以進口替代工業化的發展策略進行，採取穩定的發展方針。1954 年，總統魯伊斯克提內斯(Adolfo Ruiz Cortines, 1952 年至 1958 年執政)採取保守金融政策，並穩定了物價與金融市場，維持既定的不變的匯率政策。<sup>44</sup>

墨西哥的石油發展政策由於建立在墨西哥自獨立以來，社會結構上的不平等，財富聚集於少數人之手，因此經濟發展的成果仍未達到平均分配的狀況。到了羅培斯馬特奧斯(Adolfo López Mateos, 執政從 1958 年到 1964 年)總統執政，經濟發展仍採進口替代策略。到了 1960 年代末，墨西哥在迪亞斯奧爾達斯(Gustavo Díaz Ordaz, 1964 年到 1970 年執政)執政六年期間，開始了經濟奇蹟的發展，每年達 GDP 成長達 7%。<sup>45</sup>

墨西哥歷任總統，針對不同情境，在掌權當時的國家經濟結構中，選擇處理債務的方案。1930 年代以來的進口替代工業化策略，使墨西哥經濟邁向現代化發展；而 1980 年代以前債務金額伴隨國內經濟持續成長，形成後來的債務危機。1982 年債務危機爆發之前的兩任總統：1970 年上任的埃切維里亞(Luis Echeverría, 任期 1970 年~1976 年)與 1976 年上台的波提約總統(José López Portillo, 任期 1976 年~1982 年)主政時，持續舉借債務的「負債發展」策略，想以債務形式增加資本以幫助國家發展石油工業。但過於依賴外資與舉借債務的後果，就是帶來了債務持續累積。

---

<sup>42</sup>同註 23，頁 94。

<sup>43</sup>同註 23，頁 96。

<sup>44</sup>同註 19，頁 120。

<sup>45</sup>同註 19，頁 123。

1970 年代末期，波提約總統主政時，在墨西哥灣發現油田，使墨西哥政府進一步以發展石油工業為主，但也忽略農業的發展，造成國內產業失調。而石油工業因為國內資金與技術的缺少，使墨西哥政府大量舉債來發展石油工業。以 1982 年而言，墨西哥的石油出口佔出口總額的 74%，全國經濟發展轉到石油工業為主。

革命制度黨的統治帶來了 1982 年的債務危機，除了是 1970 年代的國際利率調升與石油危機之外，在墨西哥灣發現石油，致使政府一味投入石油工業的進行，也是政府選錯發展策略的結果。這樣的錯誤使國內社會階級分化，因債務問題而不滿上升。

1981 年世界上的工業發達國家經濟已經普遍呈現衰退；而國際市場上石油供過於求，石油價格下跌約 12%，以石油出口為主的墨西哥產生負面影響。加上 1982 年，國際利率上升，墨西哥在未獲得石油工業利益之前，反而成為拉美第一個宣布無能還債的國家，爆發 1982 年的債務危機，也使得整個 80 年代的墨西哥必須為解決沉重的債務危機而努力。

## 第二節 巴西：瓦加斯時代與軍政府

1945 年巴西結束瓦加斯的統治後，在民粹主義的盛行的情況下，政治需求上為呼應民眾需求，不斷地讓人民擴大政治事務的參與。但後續幾任民選政府由於經濟問題處理不當，加上拉美地區「高地酋」主義影響，巴西仍保有之前軍人政治的遺緒。<sup>46</sup>因此軍隊取代民主選舉與政府，進行國家統治的最高核心，巴西從 1964 年到 1985 年進入軍政府統治。

---

<sup>46</sup>高地酋主義指軍人影響政治情況，在巴西就顯示出軍人勢力干政的影響，特別是 1964 年至 1985 年間。同註 26，頁 43-74。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經濟開始活絡，此時先進國家資金向外流動，因此造就巴西利用外資的時機。1950年代中期以後，因為二戰時的外匯的累積，而且貿易條件比戰前有所改善，巴西的進口替代工業化的實施，使經濟進一步發展。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進口替代工業化犧牲了農業產品出口，加上戰時經濟成長，巴西經濟有短暫發展。而二戰後，卻因此進口替代與對農業發展的忽視使得國內分配不均，而社會不平等造成國家動蕩。<sup>47</sup>

1945年巴西結束瓦加斯的專制統治至1964年軍政府上台前的十九年間，巴西的政治不但進行民主化，而且有民粹主義的盛行，不斷地讓參與政治事務的人民階層擴大。<sup>48</sup>民選政府無力處理經濟問題又加上拉美地區高地酋主義影響，巴西仍保有之前軍人政治的遺緒。巴西遇上政治經濟雙重問題而民選政府無力處理之時，軍隊就取代民選政府，進入國家統治的最高核心。在二戰後經濟發展不順，以致於讓軍人政權於1964年到1985年統治，不同於革命制度黨在墨西哥一黨統治的穩定，高地酋主義在巴西就是由軍人政變奪權來進行統治。

庫比契克(Kubitschek, 1956年至1961年執政)擔任總統期間，改變了巴西的工業結構。1956年訂立以發展工業與公共投資來做為發展基礎工業的兩大目標。巴西政府的資金來源多樣化，想盡辦法吸引外來資金。巴西在經濟發展指標方面，以國內生產總值而言，1957至1961年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率約8.3%。巴西政府並在1957年頒布關稅法，以求保護國內的工業發展。<sup>49</sup>進

---

<sup>47</sup>顧瑩華，1992，《巴西經濟的發展與危機》。台北：中華經濟研究院，頁37-41。

<sup>48</sup>巴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至1964年軍政府政變之前，這段時期恢復了民主選舉，杜特拉(Dutra)總統、瓦加斯(Vargas)總統與庫比契克(Kubitschek)總統先後當選總統執政。在二戰後近二十年的時光，巴西政治可說是從二戰後，一度往民主道路前進。

<sup>49</sup>巴西政府提升關稅，為的就是保護巴西國內發展的新興工業。另外匯率調整對進口產業的相關影響。同註47，頁29，有相關說明。

口替代工業化、保護國內工業的發展模式，卻在日後演變成外債增加、公共赤字上升、通貨膨脹加劇、經濟增長速度減緩的窘境，使得 1961 年至 1964 年巴西的經濟成長呈衰退狀況。

1964 年執政的軍政府也創造過經濟奇蹟，使國家經濟成長，增加其統治的正當性。軍政府執政前，進口替代工業化的策略，使 1960 年代初期的巴西的農產品成本提升，進而價格增加，造成通貨膨脹的發生。軍政府上台後，採用採用「負債發展」與「先經濟增長再分配」的兩大策略，更加劇少數壟斷的問題。<sup>50</sup>負債發展策略，大量舉債後，獲得當相當不錯的經濟發展，1968 至 1973 為經濟奇蹟的時期。此發展策略雖帶來了經濟奇蹟，但持續的債務累積，使得巴西後續的經濟發展帶來債務危機。

巴西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巴西地理統計局開始統計並公布國內收分配之情況；由於進口替代的策略，社會上層收入較高階級經濟獲益高而基層的工農階級顯得貧困。自 1964 年軍政府政變上台執政，雖然從 1968 年至 1973 年，開始有了幾年的經濟奇蹟，但工資的微幅成長，並不足以使基層的工人階級能抵抗物價的壓力，而富人的所得在同一時期卻有增加。<sup>51</sup>

但巴西由於債務舉借的使用投入於石油工業發展，而仰賴石油進口的巴西在石油危機產生時，增加了國家的購油成本，其後果就是債台高築。由於 1970 年代的國際石油危機，仰賴石油進口的巴西經濟就受到衝擊。巴西政府為彌補財政赤字，並限制通貨發行而以發行債券來替代；加上 1970 年代末軍政府提出貶值國幣

---

<sup>50</sup>同註 23，頁 155。

<sup>51</sup>呂銀春，2003，《經濟發展與社會公正—巴西實例研究報告》。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頁 154-156。

Cruzeiro 30%等失當策略，後來巴西並於 1986 年與 1988 年造成重新發行貨幣的情況<sup>52</sup>。

社會與經濟結構的不平等，貧富差距拉大，已在巴西國內引起政治衝突與社會運動，當 1982 年債務問題無法解決，軍政府十八年的統治就使人民不滿的情緒高漲，使得 1985 年進行總統民選。在同時期由於第三波民主化的觀念進入拉美，就使得擁有投票權的選民可以在政治與經濟議題上要求改革，於是債務問題處理已不再是統治的政府與政黨單向就可決定。

檢討軍政府的施政，不但不能在經濟奇蹟時期控制住社會的貧富差距惡化，並因為國際利率與石油危機因素，使舉債發展的經濟策略不當，隨後與墨西哥一同陷入債務問題的泥沼中。以巴西 1970 年到 1980 年所得分配觀之，在 1970 年時，最富裕的前 1% 人口、5% 與 10% 的人口，分別擁有全部巴西的總所得中的 14%、33% 與 46%；而到 1980 年時，最富裕的前 1% 人口、5% 與 10% 的人口，分別擁有全部巴西的總所得中的 15%、35% 與 47%。另外，巴西收入最低的 50% 與 20% 的人口，收入均呈現衰退。<sup>53</sup>因此可以推論，巴西軍政府期間，社會貧富差距拉大，而債務問題也造成國內的不安，也是軍政府下台之因。

在負債發展策略下，在 1964 年至 1981 年間，不到 30 億美金的外債總額升高到約 700 億美金左右。在巴西政府控制通貨膨脹效果不彰之下，1968 年至 1973 年雖說是巴西經濟奇蹟的發展，但短暫奇蹟背後，是與其他拉美國家一樣，爆發了外債危機問題。

---

<sup>52</sup>1986 年，巴西政府將 Cruzeiro 以 1000 比 1 的比例換成 Cruzado。1988 年，又同樣是 1000 比 1 的比例換成 New Cruzado。

<sup>53</sup>同註 47，頁 79。

通貨膨脹問題進一步惡化了巴西的經濟；一般而言，通貨膨脹的原因而很多。<sup>54</sup>而巴西在二十世紀的現代化進程中，通膨的形成，與經濟財富為少數人所壟斷有關。<sup>55</sup>因此，經濟結構上的壟斷問題也與通膨有關，也惡化巴西經濟，加重巴西債務的負擔。社會的不平等惡化，使得軍政府有了執政的契機；這一時期的軍政府執政長達 21 年(1964-1985)。而軍政府在 1968 年到 1973 年，帶給巴西約 5 年的經濟奇蹟，不過奇蹟的背後，是負債發展的策略，造成 1982 年債務危機之原因。

### 第三節 阿根廷：軍人勢力之持續影響

從 20 世紀 20 年代至 80 年代末，阿根廷的經濟水平發展從世界第 8 名滑落至 58 名，也成為拉丁美洲的負債大國。<sup>56</sup>究竟是什麼樣的因素，使得這個經濟排名名列前茅之國，後來成為開發中的重債國呢？

自 1930 年代後，阿根廷為躲避世界經濟大蕭條之影響，也同其他拉美國家進行進口替代的經濟策略。1943 年貝隆開始上台執政後，其正義主義路線在阿根展開，該路線也是現在阿根廷政壇上正義黨之前身。貝隆持續進口替代行使對外隔離的策略，不但使得阿根廷的國家經濟發展停滯，並使阿根廷從世界前十強，大幅退化成現在發展中國家的水準。

阿根廷後續的軍人政權中，受到「高地酋」的影響，軍人干政風氣盛行。雖然在政治意識形態上阿根廷不受外來勢力的干預

---

<sup>54</sup>同註 24，頁 98-99。

<sup>55</sup>巴西經濟學者、同時也為巴西政府機構任職的 Ignacio Rangel 指出，巴西經濟結構被少數資產階級所壟斷，造成通貨膨脹。同註 24，頁 99。

<sup>56</sup>同註 30，頁 126。



行使獨立路線，但政治上因軍人政變頻仍，甚至於推翻民選總統進行恐怖統治，使得國內政治動蕩。另外，軍政府對外債持續舉借的發展政策，也使阿根廷這個曾在二十世紀初，為世界經濟一等的強國，在一百年後因為債務因素而常發生經濟問題。

1930 年代的世界經濟大恐慌，使得阿根廷國內要求改革的聲浪增高。除了同拉美其它國家行使進口替代工業化，也使得國內興起一股民粹主義的風潮。二戰後的阿根廷，在 1946 年由貝隆 (Juan Domingo Perón) 當選總統。在他帶領下的阿根廷，行使經濟獨立的“第三立場”發展策略。<sup>57</sup>獨立路線的經濟立場，也算是一種想擺脫對外依賴的經濟發展路線。貝隆雖然已經去世，但其創立的正義黨至今影響著阿根廷政壇的發展。而進口替代的發展策略，使得阿根廷同其他拉美國家，進入債務危機的泥沼當中。

阿根廷的經濟學家 Raul Prebisch (勞爾·普勞維什，1901 年~1985 年) 在 1949 年提出「發展主義」，希望拉美國家擺脫依賴先進國家資本的發展方式。<sup>58</sup>這樣策略的構想下，加上經濟大恐慌因素，因此阿根廷行使進口替代的發展方向。但是國家經濟發展仍需要資本，不管是貝隆的民粹主義路線或普雷維什的經濟構想的主張，都希望阿根廷發展與國際脫勾，但受限於資本的募集，阿根廷仍須依賴國外資本。

1943 年到 1955 年貝隆執政之時，為了擺脫資本主義集團與共產主義集團在國際的鬥爭，他採取國家干預國內經濟市場的方式，找出符合阿根廷的社會正義路線。<sup>59</sup>貝隆統治的十年時間

---

<sup>57</sup>即不偏資本主義也不偏共產主義，這樣的路線也吻合其國際外交路線的狀況，在冷戰時期不偏美國也不倒向蘇聯。

<sup>58</sup>同註 20，頁 26。

<sup>59</sup>同註 20，頁 201。

(1946 年至 1955 年) 外債問題還不算太過嚴重；深受人民支持的貝隆由於為贏得民心，大幅增加社會福利支出，成為後來債務惡化原因之一。貝隆在 1955 年下台流亡後，國內經濟因軍人政變顯得動蕩不安。

阿根廷外國資本的使用，一如墨西哥與巴西的負債發展策略，使得國家欠款升高，赤字高漲；而發展資本投入生產部門卻又不高，造成生產不足。<sup>60</sup> 二戰後的阿根廷，在 1946 年由貝隆 (Juan Domingo Perón) 當選總統。在他帶領下的阿根廷，行使經濟獨立的“第三立場”發展策略。獨立路線的經濟立場，也算是一種想擺脫對外依賴的經濟發展路線。

政府為改善原有的社會結構的不公平，卻讓國家財政負荷不了。另外，獲得中產階級與基層人民支持的貝隆，改變了軍方勢力原有的社會支持基礎，也種下軍方日後在 1955 年政變的原因。軍方勢力不滿加上財政支出問題，到了 1955 年貝隆下台外逃海外，而由軍方政府上台執政。

1950 年代中期開始至貝隆 1973 年返國執政前，這十幾年期間阿根廷由民選政府與政變的軍政府相互執政。這樣不安的政治動蕩，也使得阿根廷在進口替代的發展狀況下，儲蓄不足，生產性投資少；而國內消費習慣偏向先進國家，形成超前消費。<sup>61</sup>

1960 年至 1975 年十五年間，阿根廷的 GDP 增長略遜於其他拉美國家。拉美地區在這十五年間，前十年 GDP 為 5.7%，後五

---

<sup>60</sup> 沈安，2003.6，〈阿根廷債務危機的形成與啟示—阿根廷金融危機探源之二〉，《拉丁美洲研究》，第 3 期，頁 15-18。

<sup>61</sup> 同註 30，頁 126-131。

年為 6.5%，而阿根廷只有 4.3% 與 3.8%。<sup>62</sup>政局不安造成資金外逃，阿根廷的人均所得又低於拉美整體，加上 1982 年為了馬爾維那斯群島戰爭（即福克蘭戰爭，又稱馬島戰爭）大量舉債購買軍備。到了 1980 年代，阿根廷也與其他拉美國家進入債務危機的風暴中。

在 1946 年到 1983 年之間，阿根廷絕大部份時間都以軍人政權執政為主，這時期的政府以負債發展的經濟策略為主；不但沒有提高阿根廷基層人民的收入，也使得日後民主化的阿根廷貧富差距問題依舊存在。

甫上台的軍政府領袖阿蘭布魯(Pedro E. Aramburu)執政四年(1955-1958)，對原來社會中支持貝隆的工會進行鎮壓，使阿根廷工會要求經濟改革與自由的勢力受到打壓。1958 年起，阿根廷接下來十五年大部份時間都由軍政府執政，而軍政府仍維持鎮壓反對勢力的策略。到了 1973 年，重新上台的貝隆民主政府仍舊是短暫的；在 1983 年軍政府因福克蘭戰爭失敗而下台之前，阿根廷近十年間依舊為軍政府統治。在民選的阿方辛(Alfonsín)總統上台前，1946 年到 1983 年的阿根廷社會，這三十多年因為軍政府的統治，其負債發展策略與進口替代，使得社會階層的不平等持續惡化。

軍政府面對貝隆留下的財政問題未能改善；另外貝隆下台後支持貝隆的勢力與軍方衝突的社會矛盾日益惡化。對於社會衝突與民意的不滿，軍政府卻用恐怖鎮壓的統治手段，不得民心的軍

---

<sup>62</sup>同註 30，頁 126。同時期的墨西哥分別為 7% 與 5.6%，而巴西為 6.1% 與 10.8%。

政府也因為福克蘭戰爭的失敗而下台。當 1970 年代的國際經濟問題與 1982 年拉美債務危機的發生，軍政府沒有有效的經濟發展策略。政府處理債務沒有降低的狀況下，欲發動福克蘭戰爭移轉國內民眾對經濟問題的不滿，但又因為戰敗反而加速軍政權的輪替，最後由民選總統阿方辛掌權。

## 第四節 三國比較分析

就二戰後的拉美政治狀況發展，依 Russell 針對 1945 年至 1955 年的拉美政治情勢與資料的分析，墨西哥與巴西兩國政治發展上，民主化的發展在二戰後有小幅度的進步，而阿根廷因軍人干政等因素，使國家民主倒退。<sup>63</sup>社會結構已有貧富差距，使得國內基層人民生活已有問題。政府選擇經濟負債發展方式，使得國家承受相當壓力。而國際經濟情勢變遷，若拉美政府不能即時回應，即增加人民的相對剝奪感。而 1970 年代的拉美三國墨西哥一黨獨大，巴西與阿根廷都為軍政府執政，三國的政府對民意的回應有限甚至於不能回應。

從本文分析，以政治、經濟與社會三層面討論發現本時期的拉美債務發展特色：

政治層面上觀之，墨西哥到 1982 年債務危機爆發之前，由於在 1976 年波提約總統執政時，在墨西哥灣發現石油礦藏，使墨西哥為求發展石油工業，採用舉債發展方針；加上大量印發鈔票，加劇通貨膨脹；加上忽略農業發展，因此加劇社會階層的不平等，也是債務問題惡化原因之一。巴西在 1964 年進入軍政府統治，帶

---

<sup>63</sup> Russell Fitzgibbon, 1956, "A Statistical Evaluation of Latin-American Democracy,"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9, pp.607-619.

領巴西持續進行進口替代工業化策略。而巴西由於國際利率上升，以及依賴國際石油進口狀況下，使得國家開始負擔沉重的債務金額。此時期的經濟貧富差距持續擴大，使巴西不但債務金額為拉美地區最高，而且貧富懸殊也是最嚴重的地區。在阿根廷，政治上持續受到軍隊影響。政府雖變動頻繁，但由於統治階級的利益相同，因此對人民生活而言影響有限。當貝隆上台之後，異於之前的統治集團，他堅持「正義路線」，使得阿根廷國內人民對他相當支持。但其政策對國家財政負擔極大，標榜正義路線的貝隆於 1955 年受政變而下台。大致上阿根廷仍由軍人政權掌控。等到 1983 年經濟惡化與福克蘭戰爭失敗，才迎向民主化的浪潮。

因此，非民主的政治運作下對國家經濟策略的決定，若無法增加人民的所得，提升經濟，政府統治正當性就受到挑戰。加上 1976 年就開始的第三波民主化，使得拉美國家內的人民有不同的思維，對執政政府輪替可能的批評。因此，在 1982 年後，巴西與阿根廷在 1980 年代中期下台，由民主政府輪替。雖然墨西哥的革命制度黨在中央政權的統治穩定，但地方上各邦的選舉，以及國會選舉的席次上，以已經呈現席位減少之勢。

由於二次大戰後國際金融體系變得更加密切，以及國際間有許多國家需要重建，這個時期國際間各國經濟更加緊密，因此造成拉美國家發展也受國際影響。而債務問題形成不只是國際利率上升與石油危機而已，國際機構借予拉美債務的態度也影響拉美債台高築，特別是債務談判以單一國家之談判形式，使單一國家力量不足。<sup>64</sup>

---

<sup>64</sup> Danien Millet and Eric Toussaint, 2004, *Who Owes Who? 50 questions about world deb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p. 34-35.

經濟層面上表現方面，三個國家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面臨國家發展的抉擇。所謂抉擇，就是拉美國家面臨國際經濟日漸密切關聯發展下，三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策略的選擇。

一方面，拉美國家欲切割與國際的關聯，行使進口替代工業化的策略；但另一方面，拉美國家為了增加國家對外出口，必須籌措資本以發展國家工業。由於拉美國家發展的歷史，與社會既有的伊比利半島殖民遺緒，加上國內投資資本不足，三國政府必須尋求外來資本以發展國家經濟，形成「負債發展策略」，種下1982年拉美債務危機原因之一。

負債發展是拉美國家快速籌措資本發展經濟的方式。<sup>65</sup>墨西哥發現油田、巴西軍政府的經濟奇蹟、貝隆社會福利政策的開支等等措施，都可以發現拉美三國為了不同發展的理由，向國際資本借貸的舉動。

舉債發展無所謂對與錯之立場，拉美國家問題在於國家的償債策略不明；空有債權談判與歸還時間，卻無具體的財源籌措原則。在十九世紀獨立初期，拉美國家就受限於經濟發展的資本缺乏，一直需要向國外舉債。

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因應戰後的復甦策略，以及國際間各國的發展關係，更加的緊密之下，債務問題不但是拉美國家問題，也牽涉到國際的態度，包括債權銀行與債權國。在拉美國家沒有長期的經濟發展政策下，特別是國家的出口產業結構改

---

<sup>65</sup> Jones, Stephany and Osvaldo Sunkel, 1987, *Debt and development crises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9-27.

善；當拉美國家受進口替代政策影響下，等到債權歸還時限一至，特別是 1982 年左右債權歸還期限過於集中，使得拉美經濟問題隨債務危機曝露而出。

比起 1930 年代的世界經濟大恐慌，二戰後各國的經濟互動更加頻繁。拉美國家雖因 1930 年代經濟恐慌教訓，行使進口替代與國際經濟切割，但卻在國家資本尋求對外舉債，使得國家經濟的債權受制於國際經濟影響。因此，當 1970 年代的石油危機等對國際經濟不利事件發生時，拉美國家發展就顯得受國際因素制約。

拉美三國一方面仰賴外國資本，卻受進口替代工業化的限制，國家發展政策忽略了出口產業的重要性；加上國際利率陡升的變化，以致於經濟所得有限。等到拉美國家面對 1982 年債務問題，只能以債養債，造成國家的不平等發展惡化。

這時期的債務問題受國際環境變遷，不但是全球化趨勢的出現，也是國際間債務問題關係更加緊密。因此，拉美國家債務問題才會比 1930 年代與十九世紀時更加嚴重，這也就是學者 Damien 與 Eric 點出拉美債務問題嚴重之處。<sup>66</sup>

二戰之後至 1982 年債務問題發生時，這段期間為 1982 年拉美債務危機的發展原因與關鍵期。1930 年代之前，雖然拉美國家仍對國際銀行或部份債權國有積欠債務，但數額不多且當時國際經濟緊密程度不高。

而二戰後的國際經濟互動頻率增加，加上科技發展，經濟行為更加快速方便；國際資本的流動也更快。拉美政府面臨二次大

---

<sup>66</sup> Danien Millet and Eric Toussaint, op. cit. , p.79.

戰後的國際情勢，為求國家經濟發展，以借貸國際資本為主要策略，加上 1970 年代拉美各國的投資不能即時回收，造成國際催債的壓力增加，經濟債務方面升高，最後爆發 1982 年債務問題。

本論文在此強調的是，後續「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方式，包括民營化，經濟管制鬆綁，進出口策略調整，都是拉美政府的選擇。異於批評國際金融機構立場的觀點，本研究更著重於拉美政府的經濟政策的選擇。因此，1970 年代的國際利率升高與石油危機雖影響拉美經濟，但拉美背後的經濟戰略，乃其自由意志下之選擇。

在社會層面上，1982 年債務危機爆發前，墨西哥的統治為革命制度黨的一黨專政。國內除了在野政黨的勢力無力影響革命制度黨的統治外，更重要的是，墨西哥的各個社會階層都被革命制度黨所吸納，包括在野黨與軍方勢力。<sup>67</sup>因此，墨西哥比起巴西與阿根廷，二戰後至 1980 年代初期的社會結構都相當穩定。而巴西從 1964 年上台的軍政府，從統治的時間常達二十年觀之，人民接受非民主的軍政府統治觀之，也可以說巴西與墨西哥相似，兩國人民都接受政府的統治，也代表兩國國內社會的衝突有限。

相較之下，阿根廷社會衝突就顯得嚴重。從下頁表 3-1 發現阿根廷與其他兩國相較，軍人政權涉入國家社會的程度較高。這代表著阿根廷社會深受軍人政權影響，也使得阿根廷的社會深受軍人政權的恐怖統治。

---

<sup>67</sup>Hamnett, Brian, 2000, *A Concise History of Mexico*.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p.265-267.



表 3-1：三國軍人政權程度比較表

國名	軍權程度	名次
阿根廷	48.2	3
巴西	34.4	9
墨西哥	22.7	14

資料來源：湯世鑄，1996，《拉丁美洲軍人政權之研究》。

台北縣：知書房，頁 99。

阿根廷軍政府的恐怖統治帶來了對人權的迫害。從表 3-2 發現阿根廷的恐怖統治行動次數與人民死亡的人數，而軍人政權涉入人民的生活也以此迫害人權。阿根廷留下這份數據也許比實際死亡人數較低，但這代表著阿根廷社會深受軍人政權影響，也使得阿根廷的社會中人民對政府統治不滿，形成「阿根廷五月廣場母親」(Las Madres de Plaza de Mayo)的社會運動，也代表人對

軍政府統治的不信任。<sup>68</sup>

表 3-2：阿根廷恐怖行動與死亡人數

年份	政府恐怖行動次數	死亡人數
1971	35	26
1972	25	25
1973	136	58
1974	187	110
1975	194	346
1976	298	462
1977	182	181
1978	36	100
1979	6	7

資料來源：Martha Crenshaw ed. *Terrorism, Legitimacy, and Power: The Consequence of Political Violence*. Connec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1983, p.31. 轉引自湯世鑄，1996，《拉丁美洲軍人政權之研究》。台北縣：知書房，頁 207。

債務問題之所以值得關注，是因拉美地區進入 1980 年代開始，債務金額不但開始增加，而且債務問題惡化國內階層衝突。當代國際經濟貿易活動下，欠缺資金的拉美國家一定會向外舉借債務發展，債務問題一定會存在。因此，問題不是債務的存在與否，而是債務帶來的影響，也就是貧富差距因債務而持續惡化。

探討債務問題與貧富差距關係可從基尼係數觀察：數字越高表示財富越集中於社會少數人，貧富差異越大。從表 3-3 可以發現，這三個國家在債務危機之前二十年左右，國內已有貧富差異

<sup>68</sup> 同註 32，頁 202-203。

過大問題。回顧 1960 年至 1980 年吉尼分布的狀況，可以發現三國差距已經相當嚴重，而債務危機發生後，問題更加嚴重。

因此，從拉美貧富差距來判斷，拉美發展一再重複的經濟危機問題，加劇各國國內階級矛盾問題；等到 1982 年的外債危機發生，使得國內因為經濟問題引發一連串的社會運動。

表 3-3：1960 年至 1990 年拉美三國貧富差距狀況<sup>69</sup>

	1960	1970	1980	1990
阿根廷	42	44	n/a	43.1
巴西	53.0	57.6	57.8	57.0
墨西哥	55.1	58.0	50.0	53.1

資料來源：Ricardo Gottschalk and Patricia Justino, 2006, *Overcoming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pp.124-125. New York: Routledge.

總之，因世界各國在二戰之後開始密切的國際經濟活動往來，造成拉美國家在工業競爭上無法與他國競爭。經濟競爭力不夠又加上經濟發展上資本不足問題仍未解決，而依賴外資與舉債發展仍是二戰後拉美三國之發展策略；等到 1980 年代以後，債務問題就因而爆發。

<sup>69</sup> 吉尼係數的分佈是從 0 至 1，數字越大表示貧富差距越大。而表 3-3 的數字不是以 0 至 1 分布表示，而是以財富倍數狀況表示；收入最高五分之一的人口其財富收入為最低五分之一的倍數。42 指 42 倍，44 為 44 倍。

## 第四章 1982 年後：失落十年下的債務問題與處理

拉美國家因 1930 年代的世界經濟大恐慌，而採行進口替代工業化發展策略，實行至 1982 年債務危機自墨西哥爆發前，其實也為拉丁美洲國家帶來了發展的契機，增加拉丁美洲國家的實質所得。但拉美國家行使進口替代工業化的策略，由於需要大量的發展資金，因此需要大幅的外資與舉借債務金額。而 1970 年代的石油價格上升，使得石油輸出國因油價而得利，其增加資金即欲尋

求市場投資。<sup>70</sup>

極須資金借貸的拉美國家，不但因此有資金來源，而且因為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與國際利率上升，使得拉美國家的債務負擔加劇，要償還的增加金額使拉美國家無力負擔；因為這些國際經濟狀況，從1982年8月墨西哥政府率先發布無力償還債務開始，拉丁美洲國家因此陷入債務危機。

## 第一節 墨西哥：國會席次降低問題

墨西哥社會因為族群問題，使少數西班牙白人後裔掌握社會多數財富資源，進而壟斷國家生產工具。<sup>71</sup>直到1982年債務危機前，這樣的結構仍舊影響著墨西哥社會。1984年到1988年墨西哥的貧富差距持續加大的現實。這都是由於墨西哥的債務用途未能照顧全國人民，而集中於少數資產階級的身上。當墨西哥的貧富差異加大，國家發展就會動蕩不穩定。

從獨立到1982年債務危機，這一百五十八年的時間，墨西哥社會階級始終穩定。換言之，在1982年債務危機出現前，若非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方式實行，墨西哥社會結構始終穩定。若非債務問題處理受到國際干預，而且墨西哥政府，放棄進口替代工業化的發展策略，使得國內經濟與國際經濟產生關聯，國內社會結構也不會因此產生流動性與變化。因此，在舊有的結構之下，面對國際性因素而發生之債務危機，使得國內社會無法調適，經濟危機造成社會不滿，社會運動頻頻發生。

---

<sup>70</sup>李芳齡譯，Noreena Hertz 著，2008，《當債務吞噬國家》。台北：天下雜誌，頁114-119。

<sup>71</sup>1824年，墨西哥獨立建國。在獨立前後，墨西哥國內社會約有百分之六十為印第安人，百分之二十二為麥斯蒂索人（印第安人與伊比利白人的混血），另有百分之十八的白人。白人的結構包括：土生白人（南美洲出生）佔十七點八，另約佔百分之零點二的西班牙白人（伊比利半島出生），掌握高階與行政職位。同註19，頁71。

雖然墨西哥二十世紀的統治仍由革命制度黨維持，但由於社會開始不穩定，而第三波民主化在 1980 年代也來到拉美地區，使得革命制度黨統治開始動搖。1982 年的債務危機固然為國際石油價格問題與國際利率上升所導致，但由於執政黨未能處理債務問題，加上 1985 年墨西哥發生大地震，這一連串的政治經濟問題，都動搖革命制度黨統治的國本。債務與地震問題，使墨西哥政府必須在 1985 年進行大規模的改革。<sup>72</sup>

針對以上問題的改革，墨西哥政府受美國外交政策影響債務改革，使得改革必須受到國際市場影響並促進國內民主。<sup>73</sup>由於墨西哥政府太遷就「新自由主義」改革脈絡，使國際債務處理不當形成經濟危機，造成以革命制度黨為主的傳統墨西哥政治因債務危機，使得墨西哥民主化的進行中受到挑戰。傳統的政治運作受到挑戰加上拉美整體的民主化，使革命制度黨被輪替成為可能；為抵擋在野勢力的茁壯與黨內分裂使得革命制度黨處理債務問題已非執政黨單方面就能決定政策。

面對債務危機，拉美國家在 1980 年代的經濟改革針對「債務」形成的背景，將主要的改革重心放在調整通貨膨脹的問題。1982 年上台的德·拉·馬德里 (De La Madrid, 總統任期 1982 年至 1988 年) 總統接受國際金融機構要求，行使「新自由主義」改革方向，欲以市場機制與民營化提升國家償債能力，而主要的改革政策落實是 1988 年薩利納斯上台後才進行的。<sup>74</sup>為籌措還債金額，薩利納斯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重點於促進市場機制的活力。<sup>75</sup>為此他

---

<sup>72</sup>Richard Leone, op. cit., p.111.

<sup>73</sup>Ibid., pp. 112-113.

<sup>74</sup>江時學，2004，《金融全球化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安全——拉美國家的經濟教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205。

<sup>75</sup>緊急調整國內經濟政策採緊縮改革脈絡，並延期償付債務與利息，進一步借取新債。同註 41，頁 93-97。

降低關稅行貿易自由化、並鬆綁外資限制、成立北美自由貿易區與開展對外多元的經濟關係。

在債務危機爆發前，墨西哥在革命制度黨的統治，是相對程度的穩定。這種一黨獨大的統治，在歷次選舉中，都由革命制度黨壟斷國家權力，在 1980 年代以前，總統與國會多數都由革命制度黨掌握。直到 1982 年代的債務危機，加上 1985 年的地震，國內經濟惡化，在 1988 年的國會選舉，革命制度黨首次失去眾議院的三分之二多數，代表著統治基礎受到動搖。

墨西哥舊有的社會結構已奠定土地掌握於少數人手中，自 1982 年債務危機爆發以來，社會上收入所得較高者持續增加，而貧窮人口所得減少，連基本生存都有困難。當人民對既有社會結構不滿，形成相對剝奪感升高，社會就不穩定而有衝突。<sup>76</sup>

墨西哥民主運動有三個淵源：包括反對地方政治角頭的社會運動、工會職團主義促進地方民主社會運動以及學生運動。<sup>77</sup>1982 年的債務危機發生後一個月，受到這三個團體的社會運動影響，使墨西哥爆發許多社會運動，但受革命制度黨鎮壓。然而，問題並沒有解決。

1988 年上台的薩利納斯(Salinas, 1988-1994 年執政)總統，除了是延續革命制度黨政權外，更重要的是，他是整個二十世紀革命制度黨的第三代領導人。<sup>78</sup>第三代的領導人，其背後意義代表

---

<sup>76</sup>學者 Diane Davis 指出，就因為債務危機，使得墨西哥經濟惡化，不論城市或鄉村地區。而經濟狀況惡化之下，使得國內社會運動頻繁，並造成國家政治危機。Diane Davis, 1990, "Social Movements in Mexico's Cris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43, No.2, pp.353-367.

<sup>77</sup>蘇彥斌，2006，《墨西哥的社會運動與民主化》。台北：台灣國際研究學會，頁 70-71。

<sup>78</sup>同註 74，頁 205。

著對於國內社會問題將以更貼近西方式的經濟改革與政治思想來進行。而薩利納斯總統就繼續承接著自 1980 年代以來「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

自 1982 年爆發債務危機以來，從德·拉·馬德里總統到薩利納斯總統，針對債務問題兩人以「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方式為原則進行改革。在國營企業私有化、外資投資限制降低、經濟出口朝多元發展無不為了債務金額減少而努力。但是拉丁美洲的舊有社會結構下，使得資本與土地掌握於少數資本家手下，不但造成國內分配不平均，也使得國內動盪不安；進入九零年代後爆發恰帕斯(Chiapas)農民運動，進而突顯墨西哥社會階層收入分布不平均的問題。

## 第二節 巴西：債務危機與軍政府下台

1982 年的債務危機發生，巴西軍政府對經濟處理不當，不但是下台主因，更重要的是統治基礎受到人民的否定。拉美地區中的高地酋主義，指的不僅是軍人統治，更重要的是對軍人政權的統治帶有的肯定意義。軍人在軍隊的教育訓練，比起一般社會百姓，受到更多、更優良的知識訓練。因此，無形中也提升軍人在人民心中肯定的地位。軍政府對經濟處理不佳，已經使人民對軍人政權的專業統治產生不滿，這樣的統治正當性被人民否認，也是 1985 年巴西能夠回到民主的原因之一。

當巴西軍政府為解決經濟難題，持續以增加債務為手段，債務持續舉借為求經濟增長的循環下，最後反而形成少數資產階級接受經濟成長的甜美果實，而國家政府與基層人民負擔債務償還，進一步加大貧富差距。巴西的貧富差異，展現於該國的地理



區位上。GDP 分配在巴西北部與東北地區比其它地區貧困。<sup>79</sup>而貧富差距問題就帶動國內的社會運動，因為土地問題而引發之衝突。軍政府執政末期的 1980 年代，就出現了全國性的無地農民運動；農民因不當的土地改革政策而不滿，進而引發社會運動。

在 1985 年的總統大選中，雖然民主聯盟贏得的總統保座，但由於總統 Tancredo Neves 的健康不佳，由副總統薩爾內(Sarney)繼任總統。薩爾內進行巴西民主化後的多項改革，並促成人民直選總統。第三波民主化進行時，1985 年的巴西人重獲民主政治，不僅是使得政治邁向民主政體，更重要的是政府對經濟事務的處理，已不由軍人政權的單向決定並受到民意的影響。換言之，一個國家在經濟問題的發展上，必須有相呼應配合的政治制度，使得國家發展能夠調適。不論軍政府或民選政府，雖然都無法有效處理債務問題，但更重要的是，民主政府受到民意監督，更必須要尊重人民意志處理債務問題。

1990 年代的民主浪潮下，在巴西政壇上有相當重大的改變；第三波民主化在巴西蔓延，當薩爾內總統在 1988 年任內修憲，進一步使巴西人民直接選舉總統。面對 1990 年代的全球化，新自由主義在巴西實踐狀況，就落到民選總統科洛爾(Collor de Mello，任期 1990 年~1992 年)。薩爾內總統任期間將總統改為人民直接選舉有意使總統的民主代表性被強化，首任民選總統科洛爾(Collar, 任期 1990 年-1992 年)的影響就因而超過前任的薩爾內與軍政府。

科洛爾是自軍政府下台後，第二位民選總統，在民主轉型下

---

<sup>79</sup>朱欣民，2005.2，〈巴西落後地區開發的經濟與社會成效評價〉，《拉丁美洲研究》，第 27 卷，第 1 期，頁 19。

的巴西，科洛爾的施政仍舊以新自由改革的脈絡下進行。因此，巴西 1990 年代的經濟發展，以科洛爾的施政方向開始。科洛爾總統放棄了自瓦加斯總統以來，從 1930 年以後實行的進口替代策略。科洛爾總統解除管制，進一步使巴西的經濟自由化，提升外資對巴西的投入，以求取巴西的國際競爭力。

巴西債務問題尋求國外援助，因此放棄了進口替代工業化的策略，執政多年的軍政府也在 1985 年下台。民主化的巴西，在 1990 年科洛爾(Collor, 1990~1992 執政)總統上台後，進一步地接受外國銀行所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一如墨西哥的貧富差距拉大的情況，在巴西則是以全國性的無地農民運動而呈現出來，債務的改革也是在國家動蕩進行。科洛爾面對的，是一個新舊交替的巴西社會。巴西人民不但直接民選總統，並期待科洛爾總統能改善巴西債務問題並調整貧富懸殊的狀況。

### 第三節 阿根廷：福克蘭戰爭與民主化

福克蘭戰爭完後，民選總統阿方辛接替軍政府執政。在 1946 年到 1983 年之間，阿根廷絕大部份時間都以軍人政權執政為主，這時期的政府以負債發展的經濟策略為主；不但沒有提高阿根廷基層人民的收入，也使得民主化後的阿根廷貧富差距問題依舊存在。而軍政府對於社會民意的不滿，卻用恐怖鎮壓的統治手段，不得民心的軍政府也因福克蘭戰爭失敗而下台。而在 1983 年上台的阿方辛同其他拉美國家一樣行使新自由主義的改革。

自 1983 年馬島戰爭失敗，成為壓垮阿根廷軍政府的最後一根

稻草，該年選出新總統阿方辛。阿根廷隨整個拉丁美洲的債務風暴，陷入嚴重的債務危機；而整個阿根廷在 1980 年代對債務問題的處理，維繫於阿方辛總統的手上。簡言之，阿根廷因為社會發展的不公平，使得貝隆獲得支持而上台執政。但貝隆為獲得民眾支持，在社會福利的政策支出，造成阿根廷舉債外債。當貝隆於 1973 年身亡後，後來上台的軍政府仍舊要負擔對外的借款，因此當國際利率上升與 1983 年馬島戰爭的失敗，阿根廷不但進行民主化，也同時印證社會分配不公下，阿根廷外債問題惡化之因。

在 1982 年債務危機後，阿根廷放棄進口替代的策略。在阿方辛總統執政時，他要面對的問題主要是龐大的債務以及通貨膨脹的問題。不過，債務金額仍舊高漲，通膨問題也是在梅內姆(Carlos Saúl Menem, 1989 年至 1999 年執政)任內產生明顯的效果。<sup>80</sup>從阿方辛的角度來看，接受國外新自由主義的改革並未在其任內產生明顯而立即的政績。

阿方辛任內重大的經濟改革計劃，首推 1985 年的「奧斯特拉爾計劃」。<sup>81</sup>計劃目的要降低政府赤字，並改革原來的貨幣，將通行 104 年的披索改為奧斯特拉爾。物價與工資方面政府介入凍結以求穩定經濟情勢；市場改革則進行國營事業私有化，進一步開放市場。

在這樣全面性的經濟政策下，阿根廷經濟改善的層面效果不大。以債務問題而言，債務金額依然龐大；1983 年債務為 450 億美金但到了 1989 年為 633 億，雖金額不若巴西與墨西哥那樣嚴重，但阿方辛的下台後所留下的債務增加了三分之一，為未來阿

---

<sup>80</sup> 1989 年通貨膨脹率有 4929%，但到了梅內姆的貨幣改革，至 1996 年通膨率為 0.1%，至 1999 年甚至於產生通貨緊縮情況。同註 32，頁 220。

<sup>81</sup> 同註 12，頁 175-176。

根廷經濟不穩定因素又埋下了伏筆。

異於貝隆偏重左派的政黨傾向，阿方辛為激進黨，其政黨支持基礎乃為中產階級。<sup>82</sup>因此，異於貝隆照顧勞工階級與社會福利支出的政策，阿方辛的施政方向遵循「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原則；在政治上，為了符合社會對正義之期待，必須針對前軍政府的執政行為與軍人，有不符合法律之處加以審查判刑。

然而，這樣的「轉型正義」作為，卻也激發了軍人階級的不安與反彈。在經濟改善未有具體作為之下，社會階級卻充滿不安與矛盾；加上國內由於「官僚威權傳統」影響，學者 O'Donnell 指出這樣的非民主傳統遺緒的負面影響，使國家政治力干預成了經濟改革之傳統。<sup>83</sup>在政治動盪與經濟未改善的情況下，阿方辛在 1989 年提前五個月下台，由梅內姆(Menem)上台執政。

## 第四節 三國比較分析

三個國家歷經 1982 年的債務危機，至 1990 年代債務持續上升，整個二十世紀的八零年代可說是失去的十年。至 1990 年代，債務問題依舊存在，等到三國進入二十一世紀，債務問題不但沒有解決，貧富差距依舊存在，甚至三個國家都積欠了 1000 多億至 2000 多億美金的債務。

三國對於債務問題的處理，在八零年代是效果不彰的，因此，經濟問題引發了政治危機。阿根廷軍政府因此下台，即使 1989

---

<sup>82</sup>同註 30，頁 110-111。

<sup>83</sup>蘇子喬譯，Ronald Chilcote 著，2005，《比較政治與政治經濟》。台北：五南，頁 101。

年的政治動盪中，軍人階層的政變因之前的執政經驗，不為國內人民所接受，進而造成民主選舉的提前進行。巴西軍政府的統治不力，使得巴西在 1985 年進行總統選舉，使得代表在野勢力的 Tancredo Neves 與薩爾內當選正副元首；而墨西哥雖渡過危機，政治上卻開始出現變化。<sup>84</sup>

這時期的分析，以政治、經濟與社會三層面討論發現本時期的拉美債務發展特色：

在拉美政治結構中，1980 年代的政治是動蕩，由於第三波民主化的進行，使得拉美政治進一步的開放；原有的政治制度無法容納人民意見，也造成舊制度的崩潰，而迎接 1990 年代拉丁美洲的政治情勢，是除了古巴外，全面的總統民選與民主化。

國際金融機構影響仍然重要：國際債權談判由國際金融機構與各個債務國分別進行，由於分開談判使債務國受制於國際金融機構。由於不夠公開透明使得債權談判的運作空間加大。因此，債務國政府談判代表若漠視國家利益，可能使債務負擔加諸於國內民眾，特別是中下階層人民。

在拉美經濟結構中，自 1982 年墨西哥宣布暫停債務償還後，拉美各國已經陷入債務危機中。墨西哥從 1980 年到 1982 年，增加了 73%，而同期的巴西增加 31%，阿根廷 61%。債務危機的整個八零年代，十年期間的發展，巴西與墨西哥的金額已突破一千億的關卡，除了人口與國家規模影響之外，這兩個國家受「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方針影響，可說是越改革狀況越糟。巴西直到卡

---

<sup>84</sup> 墨西哥的革命制度黨，在 1976 年總統大選中得票為 100%，1982 年變成 74.2%，而 1988 年只勉強過半，得票為 50.7%；議會選舉的得票比率與席位數也持續下降。

多佐上台，才改善經濟狀況；而墨西哥債務在 1980 年代問題一直惡化。而阿根廷的經濟改革在阿方辛主導下，並沒有解決問題，甚至直到 1990 年代，債務金額也突破一千億美金的關卡。整體而言，拉美三國的債務問題與國內收入分配狀況，整個八零年代都沒有改善，才會造成三個國家全面性發展的障礙。

經濟危機依舊：因為二戰後的全球經濟體系緊密發展下，各國經濟問題比起 1930 年代的債務危機，負面的影響將會擴展至更廣泛的層面，影響的時間也會更久。而且，國際經濟危機的意義通常代表著對信心問題的危機。當國際信心不足，借貸關心產生恐慌與懷疑，而債權國的償債力不足，對經濟發展的信心就會演變成大規模經濟危機。

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不彰：不同時代面對不同經濟問題，所實行的改革政策必須背後有著經濟思想的脈絡支撐。拉丁美洲面對 1982 年債務危機下的問題，實行新自由改革策略。不論是非民主的軍政府、民選總統下的政府，或是一黨獨大的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在 1982 年後都由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指導原則下進行。單就面對債務問題而言，節節升高的債務金額宣告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失效，不論承認其政策思維是否為新自由主義脈絡，相關措施並未改善或緩和債務金額的積累。

新自由主義的改方式，其核心仰賴著民營化與市場化的手段，期望由自由競爭改善國家經濟窘態；以市場競爭方式提升償債能力。然而，拉美三國的實質償債力不但沒有上升，也由於國際的市場經濟調節力不成熟，使得資本主義精神的市場機制無法有效運用，造成拉美國家的債務一直積累。

1980年代的拉美地區，由於各國之前的進口替代工業化與負債發展的經濟政策的實施，使得各國社會狀況，呈現一種社會兩極發展的狀況。一方面資本家的財富因為政策借貸，持續增加財產，但另一方面的勞工與農民階層，卻持續負擔國家政策的成本。

因此，除了基層生活貧困的農工階層之外，學生與受民營化而影響的相關人員也是社會運動的抗議者。農人與勞工是經濟因素而參加社運，而學生身為知識份子，理想性較高而易有激進行為；最特別是受民營化而影響的參加社運的相關人員。他們不但成為「反對者」造成社會的動盪，而且在民主浪潮來臨前，他們在1980年代之前是公務人員，是原政府的「支持者」。從支持到反對，也造成政府原有的支持基礎受到動搖。

等到1982年的債務問題在拉丁美洲全面爆發後，各個國家無力解決，因此尋求國際機構與其他國家援助；而國內社會因收入分配過於集中少數人，形成的不公義，在1980年代國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導入拉美三國後，社會不公義因新自由主義更加惡化。<sup>85</sup>

---

<sup>85</sup>索薩，2003，《拉丁美洲思想史述略》。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頁329。

## 第五章 1990 年以來民主化浪潮與債務問題處理



拉美各國在債務問題處理上，經過 1990 年代以後的民主化，由於墨西哥、巴西與阿根廷分別在 1994 年、1999 年與 2001 年分別發生經濟危機，可以說因為債務問題而引發的經濟問題一直存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三國債務問題處理情況又不盡相同，什麼因素使阿根廷的債務處理優於其他兩國而各國又擁有什么問題，為本章要討論之部份。

從表 5-1 可以整理出大致上債務發展之脈絡：1982 年債務危機發生前，拉美國家已有借貸債務之歷史；在債務危機發生後，到 1992 年，債務金額持續增加且改革不彰，是 1980 年代是「失落十年」。而 1990 年代以後債務仍然增加。

表 5-1：1978-2004 拉美三國外債金額 單位：百萬美元

年份	1978	1980	1982	1984	1986	1988	1990
阿根廷	12496	27162	43634	46903	51422	58473	60973
巴西	53614	70957	92812	105265	111045	113469	122200
墨西哥	33946	50700	87600	96700	100500	100900	99700
年份	1992	1994	1996	1998	2000	2002	2004
阿根廷	58000	79069	99500	147634	155015	156748	171205
巴西	124700	148295	178161	223792	216921	210711	201373
墨西哥	106000	139818	157200	160258	148652	134980	130925

資料來源：1978-1992 年債務金額來源，張寶宇、周子勤與呂銀春，1993，《拉丁美洲外債簡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頁 48-249。1992-1996 年債務金額來源，李明德，1999，《1999 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發展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頁 297。1998-2004 年債務金融來源，蘇振興，2008，《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發展報告（2007 年-2008 年）——社會和諧：拉美國家的經驗教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頁 344-345。

## 第一節 墨西哥：自由貿易區與農民運動

1990年代的墨西哥是動盪不安的時期，社會運動頻繁出現與1994年的經濟危機影響國家安定之外，也受到國際的金融危機影響。<sup>86</sup>在社會與經濟的不安下，表現於墨西哥政壇的狀況為：革命制度黨的控制力下降，在野的勢力崛起，中央與地方為財政問題衝突提升，國會已不為革命制度黨一黨獨霸。

1994年，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greement)生效實施，但同年也發生農民運動。薩巴達(Zapata)農民解放軍成立，在恰帕斯(Chiapas)州掀起農民運動。恰帕斯為墨西哥國內貧困的一個州，州內的原住民大部分為農民。由於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實施衝擊該州農民，加上長期以來墨西哥既有的土地分配過於集中少數地主問題，造成經濟與政治的壓迫，使該州農民發起社會運動。由此可知，墨西哥社會結構上既有的土地問題造成農民生計問題，加上革命制度黨政府未妥善處理，以至演變為國內的社會運動。

國內由於要縮減債務，因此必須減少國家的投資或支出。當國家建設減少，率先影響的是收入有限的基層人民，而非經濟寬裕的資產階級。雖然經過1982年債務危機的暫時緩解，但由於國內經濟結構並沒有改變，貧富問題持續加大。當墨西哥表面上的債務談判，似乎與國外債權銀行和債權人有了解決共識，卻在1994年又面臨經濟危機。<sup>87</sup>

---

<sup>86</sup> 1994年墨西哥有披索危機、1997年有亞洲金融風暴、1998年俄羅斯也發生金融危機以及1999年巴西的經濟危機，都可以發現在全球化下，國際金融體系的互動緊密，相互影響的程度也加深。因此，1990年代的國際體系下，金融危機可說是相互影響。

<sup>87</sup> 通貨膨脹從1987年180%至1994年7%，而負債率(債務與出口之比重)從1982-1983年的340%到1994年已降至192%，同註74，頁211。但仍須注意債務金額與出口比仍舊龐大且1994年又因匯率策略不當造成1994年的經濟危機。

革命制度黨在薩利納斯之後，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原本為科羅西歐(Luis Donaldo Colosio)，但競選時被暗殺而由塞迪約(Ernesto Zedillo, 總統任期 1994 年至 2000 年)替代；塞迪約面對的是一個複雜且紊亂的經濟情勢。由於前總統薩利納斯將經濟改革放在政治改革之前，因此造成他注重經濟改革並將經濟發展優劣與 NAFTA 結合在一起。<sup>88</sup>而薩利納斯也因為欲競選世界貿易組織總裁之位，未針對墨西哥情況貶值披索。等到塞迪約於 1994 年 12 月就任總統，為適應國際貿易需求貶值披索（墨西哥貨幣名），由於貶值幅度過大，引起國際投資人信心危機，造成拋售披索，披索隔年通貨膨脹達 52%。<sup>89</sup>結果，墨西哥的外債金額表現，在塞迪約首年執政下，到了 1995 年為 1642 億美元，自 1994 年以來增加了 240 億美元。

這時期的墨西哥薩巴達農民運動，與 1994 年 NAFTA 正式運作時於同年發生，是債務問題惡化歷史的印證。自 1982 年的債務危機以來，由於執政的革命制度黨與國外金融機構配合，在新自由主義的原則下調整國內的政策。這樣的作為不但使國有企業民營化，而且進一步開放外資進入，加上對國內農業政策的失當，不但使失業上升，所得分配向少數資本家集中，使得基層人民生活困苦。在總體的政策運作不良之下使得民怨爆發，而且也讓國內不安，使得繼任執政的塞迪約輸掉 1997 年的期中選舉。

墨西哥舉新債還舊債，而國際投資信心不足造成，利率升高；國內基層人民為還債卻又必須縮減所得，甚至犧牲就業機會。因此，當 1994 年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推動，不但使國內農民掀起社會運動，造成國家不穩定；而墨西哥政府在 1994 年年底的貨幣貶

---

<sup>88</sup> Hamnett, op. cit., 290-291.

<sup>89</sup> 同註 19，頁 148。

值政策不當，造成外資恐慌外逃，因此使墨西哥經濟雪上加霜。

整個 1990 年代的墨西哥，雖然仍由革命制度黨的總統領政，但兩位總統（薩利納斯與塞迪約）的經濟政策仍然受到「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指導原則下進行。在更進一步的經濟開放作為下，在 1994 年正式運作實行的北美自由貿易區(North America Free Trade Association, NAFTA)，就成為新自由主義在墨西哥國內的具體作為。

薩利納斯在 1991 年至 1994 年的執政，就對墨西哥債務問題而言，是沒有消除的，在這其間外債增加了 220 多億美金。<sup>90</sup>而失業率從 1991 年的 2.7%，到 1994 年上升至 3.7%；雖然 GDP 的成長使 1991 年到 1994 年的外債比例(%GDP)下降，但仍看的出來中下階層人民生活的困境，因為所得分配的狀況上，向收入前 20% 的人口集中。<sup>91</sup>

1994 年的恰帕斯農民運動正可以解釋這個事實。國內持續的貧富差距，而基層農民日常生活無法維持下去，造成了農民為求基本生活而掀起了以農民為組織的社會運動；加上當年因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生效之時，農民因美加地區農作物進口的衝擊，就因此引發許多社會運動，造成國內社會不安定。而國家持續增加的財政赤字，加上 1994 年的披索貶值的政策不當，造成國際投資者的恐慌心理，因此國內短期流動的資本外逃；長期以來墨西哥的金融體系本身的不健全，形成 1994 年的「披索危機」。

---

<sup>90</sup>墨西哥 1991 年外債為 1170 億美金元至 1994 年為 1398 億美元。李明德，1999，《1999 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發展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297。

<sup>91</sup>同註 77，頁 59-63。

墨西哥的民主化下，革命制度黨的影響衰微不只在總統選舉上；國會選舉也可以發現革命制度黨的影響下降。從國會選舉觀之，1997 年的 Federal Chamber of Deputies（墨西哥下院選舉）選舉，革命制度黨首次失去國會多數，未能在 500 席的總席次上獲得過半多數塞迪約總統被迫與掌握 122 席的國家行動黨合作。<sup>92</sup>

政治上之種種政策的改革開放，卻是人民的不滿加劇與 2000 年政黨輪替。Klesner 認為，在 1997 年國會選舉上，革命制度黨的挫敗使在野黨勢力上升有三大因素：1982 年債務危機、1985 年地震以及新自由主義的政策。<sup>93</sup>除了地震天災的問題外，1982 年開始的債務問題持續惡化，債務金額持續升高，經濟問題沒有解決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策略效果未能解決人民問題，使得墨西哥在 1990 年代社會運動頻仍，都是革命制度黨失去總統政權以及失去國會多數席位之因。

墨西哥在 1984 年時，最貧窮的 10% 人口，其收入占全國人口收入的 3.2%，至 1998 年，下降至 2.8%。而收入最富裕的前 10%，在 1984 年收入占全國的 25.8%，至 1998 年上升為 34.8%。<sup>94</sup>從貧富人口收入數據的變化當中，可以發現貧者愈貧、富者恆富的 M 型社會階層落差持續惡化，這也是債務危機帶來的問題。

相對於進口替代工業化的發展方式與伴隨關稅壁壘的貿易策略，新自由主義的方式就是解除這樣的管制方式，墨西哥政府又限於國際壓力，受到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之影響必須被介入墨西哥國內的市場，以便於國際資本進入墨西哥。同時墨西

---

<sup>92</sup>Klesner, Joseph, 1998, "An Electoral Route to Democracy?"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31, p481.

<sup>93</sup>Ibid., pp. 480-482.

<sup>94</sup>蘇振興，2006，《拉美國家現代化進程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457。

哥將國內的國營企業民營化，一方面求取國庫資金，另一方面將無效率的國家企業轉由私人經濟，以求經濟利益；同時，墨西哥政府又持續舉債來償還即期債務。然而新自由主義的改革上，墨西哥的債務金額仍超過一千多億美金。

迫於國內外經濟動盪，包括 1999 年巴西的經濟危機之波及，墨西哥的整體經濟狀況是不穩定的，直到 1999 年，外債總額仍高達 1663.8 億美金。<sup>95</sup>債務金額數字雖起起伏伏，但自 1994 年上台之初至 1999 年執政最後一年，265 億美元的債務增加不但是賽迪約的經濟政策問題，也是自 1982 年債務危機發生以來，革命制度黨未解的問題，而革命制度黨也在 2000 年下台，由國家行動黨(PAN)所輪替。

從總統選舉結果可以看出革命制度黨支持度逐漸下降，不受國內人民支持：革命制度黨在 1982 年債務危機發生前，總統選舉都是以極高的得票率當選。但在 1982 年總統選舉「只有」68%的得票率，比起之前突破百分之八十的比率而言，是降低了許多。<sup>96</sup>到了 1994 年，革命制度黨的候選人不但被暗殺，補提名的總統當選人塞迪約也有只有 48%的得票率；到了 2000 年，國家行動黨的候選人福克斯(Fox, Vicente,任期 2000 年至 2006 年)終於以 42%擊敗革命制度黨當選總統。

民主活動與社會運動的持續進行，自 1988 年選後，使得革命制度黨的統治持續受到挑戰。<sup>97</sup>進入 1990 年代後，各式各樣的民主運動的進行，可以說是對革命制度黨統治的挑戰，也可以視為

---

<sup>95</sup>蘇振興，2008，《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發展報告(2007-2008)——社會和諧：拉美國家的經驗教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 344-345。

<sup>96</sup> 1964 年總統選舉 PRI 的得票率為 87%，1970 年為 85%，1976 年為 88%。同註 19，頁 151。

<sup>97</sup>Hamnett, Brian, op. cit. , p.284.

執政黨統治正當性開始受到動搖。從債務危機之前的 1976 年總統選舉，至 2000 年政黨輪替，革命制度黨得票率一直下降。雖然人民投票並不一定是針對債務議題進行，但可以確定的是在 1980 年後，隨著第三波民主化來到墨西哥，以及國內經濟日益惡化，社會運動頻仍，革命制度黨的統治也逐漸衰微，最後在 2000 年政黨輪替。

福克斯總統上台後，首先針對國內貪腐問題改革，減少國家財政不必要之浪費。<sup>98</sup>經濟政策上結合左右派的優點，行中間路線的經濟策略，但仍承襲前政府新自由主義的路線。福克斯總統政治與經濟的改革成果上，雖未有效增進國家償債能力，但至少使債務金額徘徊於 1300 億美金左右未進一步惡化。

## 第二節 巴西：貧富差異持續之惡化

巴西債務增加引發之問題，最值得關注的地方在於社會上的貧富差距惡化。巴西自 1979 年至 1996 年，其社會上貧富階層的收入分配幾乎無重大變動。<sup>99</sup>換言之，自 1982 年的債務危機以來，該國的社會問題一直都未解決使 1980 年代因為社會問題所引發的群眾運動就一直延續到 1990 年代。

為處理人民發起的社會運動，在呼應人民的期待下，科洛爾施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但新自由主義政策未改善國內經濟前，1992 年科洛爾就因為貪污問題下台。在政治動蕩、國會未有穩定多數執政下，繼任副總統佛朗哥(Franco)受情勢所迫，建立一個於國會多數合作的六黨聯盟聯合政府。<sup>100</sup>佛朗哥針對科洛爾的問題加以

---

<sup>98</sup>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在墨西哥的分支機構評比顯示，從 2001 年 10.5 分進步到 2003 年的 8.5 分，貪污問題有所改善。同註 41，頁 108-109。

<sup>99</sup>同註 94，頁 456。

<sup>100</sup>蔡東杰，1999.11，〈巴西在第三波民主化過程中的轉機與危機〉，《問題與研究》，第 38 卷，第 11

改革，除了建立委員會反貪腐之外，並改善與軍方關係，補助軍人薪資並任命退休將領擔任國家要職。

科洛爾代表巴西經濟政策的新時代開始。<sup>101</sup>不過，他的施政成效是難以評估的，四年一任的職位卻因貪污問題在 1992 年提前下台，由副總統佛朗哥(Itamar Augusto Cautiero Franco, 接任科洛爾剩餘任期 1992 年至 1995 年)繼任。接任總統的佛朗哥雖針對科洛爾施政缺失以挽回人民對政府之信心，但經濟惡化問題使巴西不穩定。為解決長期以來的經濟問題，改善貧富差距問題，佛朗哥於 1994 年任命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Silva Cardoso, 任期 1995 年至 2003 年，連任一次)出任財政部長。直到 1995 年卡多佐上台，巴西的經濟又走向另一個層次。科洛爾許多的自由化改革，包括對外降低關稅等吸引外資之措施，在其短短的兩年任期其實難以評論功過。而 1990 年代的巴西經營實際上繫於卡多佐。

科洛爾在 1994 年任命卡多佐為財政部長，是科洛爾總統任內第四位財政部長。<sup>102</sup>當時巴西的政治與經濟都相當不穩定，而在這樣的狀況下，卡多佐面對許多的問題將待處理，其重要的改革首推黑亞爾計劃(Real Plan)。1994 年當時的巴西通貨膨脹問題嚴重，高達 909.7%，嚴重危及一般人民之生活狀況。<sup>103</sup>卡多佐將原有的貨幣改成黑亞爾(real)，一方面削減預算以降低赤字，一方面穩定經濟降低通貨膨脹。卡多佐之所以能在 1995 當選總統，並修改憲法總統不得連任之規定，於 1999 年連任總統成功，是因為他的雷亞爾計劃是自 1986 年克魯扎多經濟改革計畫以來，最近十年

---

期，頁 167。

<sup>101</sup>Pang, Eul-Soo, 2002,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formation in Argentina, Brazil and Chile since 196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pp.124-125.

<sup>102</sup>同註 27，頁 167-168。

<sup>103</sup>同註 24，頁 108。



之間七項經濟改革計劃中，最成功也最有效果。<sup>104</sup>從具體的數字觀之，通貨膨脹率從 1994 年的 929%，到 1995 年降至 14.78%，到了卡多佐競選總統連任之前一年，更只有 1.71%。<sup>105</sup>

改善通貨膨脹的問題使卡多佐順利贏得 1995 年的總統大選。卡多佐總統要面對的是複雜的社會、經濟與政治問題，甚至受到國會阻礙。外在受到墨西哥危機影響，國內的社會運動與軍隊罷工、赤字問題嚴重，外債節節升高以及通貨膨脹問題。<sup>106</sup>卡多佐面臨這樣的情勢在有限的政治資源運用上，能解決的問題有限。卡多佐總統的選擇除了受以上約束外，更牽涉到個人最基本的政治考量，即個人連任總統與否。因此他如何將改革利益極大化，擴及至各社會階層成為重點。

在 1995 年至 1998 年期間，巴西人民整體收入是有增加。<sup>107</sup>換言之，巴西在卡多佐首任執政期間收入呈現穩定增加。因此，巴西國會將 1998 年修憲之前，巴西總統不得連任之規定修改。卡多佐在此政績之下，受國會多數支持，修改憲法使總統得連任一次。受到國會多黨聯合支持，卡多佐以過半多數選票贏得 1998 年總統選舉。

卡多佐雖影響整個巴西 1990 年代的經濟發展，但其作為是有限的，即使控制了通貨膨脹，使人民的基本生活能維持，國家債務問題在卡多佐任內並無明顯改善。在其首任總統任內，1997 年結束時外債金額站上了 2000 億美金的關卡，是史上新高；加上

---

<sup>104</sup>同註 100，頁 85-87。

<sup>105</sup>同註 24，頁 108。

<sup>106</sup>劉詩馨，2006，〈巴西經濟政策與貧窮問題(1990-2002)〉，碩士論文，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頁 90-92。

<sup>107</sup>廖鴻達，2000，〈一九九〇年代巴西經濟改革的政治經濟分析〉，碩士論文，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頁 126。

1999 年國內的經濟危機，卡多佐要面對的挑戰依舊，巴西自 1982 年以來的債務問題仍未解決。

巴西為債務第一大國，在 1982 年的債務金額約 832 億美金。<sup>108</sup> 國內通貨膨脹嚴重，使得國內投資環境不佳；而國外資金借貸利率上升：1985 年債務利率為 9%，1990 年為 8.2%，到 1995 年為 7.3%，2000 年 8.5%。<sup>109</sup> 巴西國內利率加劇，通膨嚴重，財政負擔沉重。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救援前，國家債務惡化消息甚至於隱瞞人民，因此債務問題爆發後，也造成國家的動蕩不安。

巨大債務讓原來就貧富差距甚大的巴西社會更加動蕩不安。1960 年代至 1990 年代巴西的貧富差距狀況，大致趨勢呈現出的狀況：巴西國內收入最高的前 20% 人口，30 年來其收入增加。收入佔全國中間的 60% 人口，即中產階級，其收入約減少約四分之一。最窮困的 20% 人口其收入不增反降。<sup>110</sup> 另為，貧富差距影響了巴西國內社會的穩定性；在 1997 年就有 658 起的土地衝突。<sup>111</sup> 而 1980 年到 2000 年，就有 1520 人因而死亡。<sup>112</sup> 由此可見，這 20 年因國內貧富差距造成巴西社會中衝突的影響。

1998 年至 2002 年第二次任期中，債務問題依舊。因債務而惡化的國內貧富差距問題仍未解決。<sup>113</sup> 受到右派聯盟支持的卡多佐仍未解決貧富差距問題，國內基層農民因基本生活問題而發動的無地農民運動依然存在，國內地區發展不均衡之下，在 2002

---

<sup>108</sup>同註 12，頁 180。

<sup>109</sup>The World bank, 2006,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p. 77.

<sup>110</sup>同註 107，頁 126。

<sup>111</sup>徐世澄，2005.12，〈巴西勞工黨政府應對社會矛盾的主要作法〉，《拉丁美洲研究》，第 27 卷，第 6 期，頁 10。

<sup>112</sup>同註 25，頁 165。

<sup>113</sup>同註 51，頁 78-103。

年選舉右派敗選，左派總統魯拉(Lula da Silva, Luiz Inácio,任期 2002 年至 2006 年，並於 2006 年連任成功 )。

而巴西債務在 1980 年代的發展，大致上是持續增加的，從 1980 年到 1990 年間，債務從 500 多億美金加倍為 1000 多億美金。另外，加上通貨膨脹率已經上升為四位數，從 1964 年的 92% 到 1988 年的 1037.6%，可以發現巴西國家的經濟發展困境。<sup>114</sup>巴西的債務處理直到 2004 年約為 1500 億美金。從 1982 年約 400 多億美金到 2004 年，以近四倍成長的幅度上升，可見債務問題的處理與國家經濟發展的策略上有了問題，國家的出口創匯能力並無增長。1990 年自科洛爾總統所推出的新自由改革，對巴西人來說，也看不見出口創匯以償還債務的發展。因此，國內經濟發展方式，因政治人物的策略選擇不當的弊端由此可見。

巴西現任總統魯拉對於債務問題的處理，並非一味放任由其增加，而是因為該國貧富差距問題惡化。在有效處理債務問題以前，如何穩定貧困人民生活成為其首要政策，因此推出「零饑餓計劃」。<sup>115</sup>針對貧困問題的「零饑餓計劃」雖為改善人民生活而設，但持續的公共支出仍拖累巴西財政，新自由主義的效用不彰，債務問題依舊嚴重。<sup>116</sup>

### 第三節 阿根廷：梅內姆時代與左派興起

梅內姆上台執政，在阿根廷的政治發展上有幾項劃時代的意義：首先，在當時乃為阿根廷近六十年來，首次政權以民主形態的方式進行輪替。其次，由貝隆主義所延續的正義路線東山再起，

---

<sup>114</sup>同註 24，頁 94-98。

<sup>115</sup>同註 27，頁 181-183。

<sup>116</sup>鍾宛諭，2007，〈拉丁美洲新興左派興起因素之研究〉，碩士論文，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頁 105。

正義黨重新執政。最後，梅內姆的當選，也奠定正義黨的路線在阿根廷政壇中為人民所接受，直到 2007 年總統大選為止，這近二十年的光陰，大部份時間為正義黨所執政。

梅內姆總統在 1989 年的上台有許多歷史性的意義。他是六十年來首次以民主選舉方式輪替掉民選總統（前任民選總統阿方辛），更是以正義黨籍身份輪替掉激進黨的總統。除此之外，不同於阿方辛，他是人民直選的總統，民意代表性極高。所以，梅內姆執政衍生出總統不受監督、代替國會立法濫權之問題；除了人民選票之外，不受任何拘束。<sup>117</sup>

在 1989 年上台的梅內姆，比起阿方辛而言，執政更具有權力，因為正義黨在國會參眾兩院掌握過半多數，並掌控地方州政府多達十七席的州長(全國共 22 州)。因此，梅內姆執政更具權力。最具體的作為展現在他同巴西總統卡多佐，在任內修憲，並延長自己一任的總統任期。<sup>118</sup>

關於阿根廷總統權力分析，學者 Larkins 指出，阿根廷總統權力極大，除定期改選外無任何約束力。因此，面對 1989 年國內經濟問題，梅內姆雖是完全執政的總統，但也必須肩負起完全執政的責任。就降低通貨膨脹問題，他是成功的，從 1989 年 4924% 到卸任時不到 1%，就人民基本生活而言，梅內姆改善基本生活。但外債在新自由主義的政策脈絡下，卻從 1989 年的 633 億美金，到 1997 年突破 1000 億美金大關。梅內姆的執政，就債務問題上，並未解決債務持續惡化，終究於 2001 年爆發阿根廷經濟危機。

---

<sup>117</sup>Larkins, Christopher, 1998, "The Judiciary and Delegative Democracy in Argentina,"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31, pp.423-442.

<sup>118</sup> 阿根廷 1992 年修憲，將總統不得連任改為連任一次，並由原來六年一任縮為四年一任。

梅內姆的經濟改革思想也與墨西哥和巴西相同，受到國際金融機構的影響，債權的談判上阿根廷政府不得不配合，因此梅內姆的上台對阿根廷而言，依舊是必須和國際合作實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措施。由於前總統阿方辛為控制赤字問題而以大量印發鈔票以求降低赤字；造成的後果就是通貨膨脹，1989年通貨膨脹率為4924%，使得梅內姆總統上台後要面對如此棘手的經濟困局。

梅內姆總統雖為正義黨，但不跟隨貝隆主義的「正義路線」。他的政策原則為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除了放棄進口替代工業化的經濟路線外，進一步解除政府對經濟的不當干預，以求市場機制調整恢復阿根廷的市場活力。梅內姆具體的作為包括金融改革、實現「兌換計劃」並降低金融管制、為因應1994年墨西哥披索危機成立了信託基金、降低關稅實施貿易自由化、改革社會福利計劃與勞工制度、減稅並促進國營企業自由化，提升競爭力。<sup>119</sup>

梅內姆執政期間，雖然被譽為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模範生，但從後來阿根廷於2001年爆發的經濟危機，將梅內姆時代的經濟結構問題曝光出來。1990年代的經濟成長仍舊有分配不平均的問題。基層人民在經濟結構的弱勢依舊存在，甚至於失業率上升與貧困人口增加也是影響基層人民。這樣的舊有社會結構下，影響著阿根廷自1980年代債務危機以來的經濟結構。政府的經濟改革策略，仍舊加深阿根廷貧富差距的問題。

當阿根廷的經濟結構未隨著1990年代的經濟成長而改變，進

---

<sup>119</sup>江時學，2004，《阿根廷危機反思》。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頁97-109。

入二十世紀末全球經濟危機時，阿根廷無法擺脫巴西、俄羅斯與東亞等國的經濟危機的影響。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當經濟結構上的體質不良，受到上世紀各國的經濟危機影響，2001年就爆發了阿根廷經濟危機。

新自由主義改革對阿根廷的貧富差距沒有改善。1980年阿根廷最貧窮的10%人口，收入占全國所得約2.8%，到了1997年為止，下跌至2.1%。而同時期最富裕的10%人口，其所得從約占30.9%，上升至35.8%。<sup>120</sup>社會階層中的貧富差距，始終未有明顯的改善。即使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債務問題引起的貧富差距問題仍未解決。

阿根廷在債務問題處理上，自1990年代進行民營化的策略，民營化的範圍之大，甚至大過於墨西哥與巴西。這不但使得國家部門的企業落於少數資產階級上，也使得基層人民就業機會的喪失。因此，造成貧富差距的擴大。從1980年至1997年，最貧困的人口收入佔全國2.8%下降至2.1%，而最富有的10%人口收入從佔全國的30.9%上升至35.8%。<sup>121</sup>為解決債務所推行的民營化，不但使貧富差距加大，而且債務的持續舉借與民營化都形成阿根廷的經問題，因此2001年阿根廷又發生經濟危機。

由於債務金額短期內積累，阿根廷雖不是拉美國家的第一債務大國，但是社會的情況卻因短期積累的巨大債務金融形成動盪。<sup>122</sup>換言之，短期的債務壓力形成國內人民相對剝奪感的上昇，造成社會上貧富差距的問題。

---

<sup>120</sup>註94，頁457。

<sup>121</sup>同上註。

<sup>122</sup>巴西在2006年債務金額為1725億美金，為拉丁美洲第一重債國。

2001 年經濟危機爆發後，由於政府為拯救國內銀行債務問題、地方政府 2001 年至 2003 年的債務轉移 97 億至中央政府，以及通貨膨脹的問題等三種因素，形成債務問題惡化原因。<sup>123</sup>

根據學者黃志龍在 2005 年指出，阿根廷債務問題處理在債務計劃交換上，有其具體成果：由於總統基什內爾(Néstor Carlos Kirchner,任期 2003 年至 2007 年)談判的努力、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幫助阿根廷債權談判，說服國際債權人，以及國際債權人的妥協與配合。<sup>124</sup>但黃志龍指出即使債務金額有減少的波動，債務問題依舊存在。債務問題真正癥結點在於：阿根廷實質償還債務的能力依然不足。

因此債務問題在阿根廷的發展至 2005 年前後，債務金額的狀況依舊嚴重。這兩年的發展雖有金額數目的降低與波動，但債務的減少如同歷史的發展可能是短期波動，如同表 5-1 所指出，1990 年至 1992 年阿根廷債務金額暫時降低，但債務發展依舊影響阿根廷經濟發展。

## 第四節 三國比較分析

而債務問題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由於千禧年的來到，宗教脈絡影響下，拉美深受天主教影響，在國際間為了債務問題提出了千禧年減債計劃(Jubilee 2000)。國際上有非政府組織及宗教團體運用宗教赦免的想法，為了使所有債務國家有「重生機會」因而提出此計劃，但效果有限，拉美債務問題依舊嚴重。<sup>125</sup>

---

<sup>123</sup> 同 95，頁 106-107。

<sup>124</sup> 同前註，頁 105-115。

<sup>125</sup> George Potter, op cit., pp. 127-132.

就政治面向而言，債務問題處理受以下因素影響：

一、民主化：1990 年後，拉美國家的政治結構上有了重大改變。巴西自 1985 年軍政府下台，阿根廷自 1983 年福克蘭群島戰爭失敗後，軍政府也下台，而墨西哥的總統選舉，也隨後在 2000 年進行政黨輪替。從舊有的非民主政治結構，到現代民主化選舉的進行，拉美國家的政治民主化，使得債務問題有被民意干涉的可能，比起之前非民主時代下，債務問題任憑政府單向決定，有了巨大的改變。

政府在一連串改革計劃中，新自由主義的改革以市場機制進行，在民營化的方向下，一定會影響到部份公務人員或政府支持者的利益。因此，造成原有政府的支持者反而成為反對者，在民主化與新自由改革浪潮下，政府的支持度與原有的選民基礎下降。這也是阿根廷與巴西軍政府下台，而墨西哥的革命制度黨在各選舉得票持續降低之因。

民主化並不代表一定會有效的將債務減少，也不表示民主政治的推展能夠解決經濟問題。本文要強調民主轉型對拉美三國、甚至於全拉美地區的意義，在於債務問題的處理已受到民意的監督的影響。換言之，人民因為民主政治的推行透過有效之選舉來決定國家發展之方向。<sup>126</sup>

二、政治貪污：不論是一黨獨大的墨西哥革命制度黨、巴西的前總統科洛爾還是阿根廷的梅內姆，似乎這三個拉美地區的新

---

<sup>126</sup> 拓夫譯，Barrington Moore 著，1991，《民主與獨裁的社會起源》。台北：桂冠，頁 394-397。



興民主國家都有政府貪腐問題。不論是已經確定的判決，還是未被發現的醜聞，拉美政府貪污問題不斷的發生。因此，債務金額用途是否妥善被運用，也可能是債務金額升高原因之一。

拉美地區國家之領導人，以政府之名義舉債借款，但實質金錢卻不一定用於國家政策支出上，被政治人物中飽私囊造成債權由國家負擔，債務用途的使用過程不夠透明公開，都是債務問題惡化的原因。

三、國際金融機構相關問題：國際間雖因應西元 2000 年的到來推行千禧年(Jubilee)相關的債務處理計劃，但從三國債務的金額觀之，債務僅只是稍微降低。況且，相關的債務處理僅是「赦免」債務數目，並未提升拉美三國的償債能力。因此，拉美債務問題仍受國際債權銀行與金融機構等方面限制。

就實際國際經濟援助上而言，「債權人」對拉美債務問題處理上，給與拉美債務國之貸款，有其現實利益考量。在二十世紀時，美國為拉攏拉美政治上意識型態為中間偏右之政黨與政府，因此國際債權國與國際銀行才予以金援，並使期待投入之資本在拉美地區能夠獲利。因此，所謂金融援助仍有債權方之自利利益考量。

四、左派政府與債務處理：1990 年代隨著蘇聯解體，左派的意識形態在國際政治發展中，曾因此為之挫敗。拉丁美洲的政治在 1990 年代，曾一度為新自由主義脈絡下的政黨所執政；但由於 1994 年、1999 年與 2001 年代先後於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所出現的經濟危機，使新自由主義改善效果有限，債務問題依舊存在。

到 2006 年左右，拉美國家在這一年左右的大規模的選舉浪潮

進行下，許多國家已經由左派政府執政，可說是左派東山再起之時；然而有趣的地方在於這些拉美左派政府，改革路線初步觀之仍以新自由主義改革脈絡進行。<sup>127</sup>由於 1980 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方式依然被採用下，在短期之內拉美國家債務問題處理，減債的效果除非是債權方赦免或債權轉移，否認對於拉美國家實質償債能力依然有限。

經濟因素影響債務，債務問題依舊存在。債務問題在 1980 年代十年失落後，到了 2000 年債務問題依舊嚴重；債務金額的增減趨勢呈現增加，並沒有緩解下來。墨西哥從八零年代的 1000 多億美元，到邁向千禧年約增加至 1500 多億美金。巴西同一時期則增加一倍，從 1000 多億增加至 2000 多億美金。阿根廷同時期則從 600 多億美金站上 1000 億美金。換言之，近 20 年的債務問題處理卻只是債務金額的持續增加。

回顧三國債務問題，阿根廷國債務發展異於墨西哥與巴西情況。巴西在 1984 年債務突破 1000 億美金，墨西哥在 1986 年也突破這個關卡。到了 1992 年，墨西哥與巴西債務金額分別為 1060 億與 1247 億美金，阿根廷在 1992 年金額還不到 600 億美金。<sup>128</sup>但到了 2000 年，阿根廷到了 1550 億美金，而墨西哥與巴西債務金額分別為 1486 億與 2169 億美金。<sup>129</sup>換言之，在 1990 年代這 10 年左右，阿根廷成為三個國家中累積債務金額最高的國家。

從歷史發展證明，拉美三國接受了國際金融組織所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運動，不但未改善債務問題，甚至有惡化。

---

<sup>127</sup> Jorge Castañeda and Patricio Navia, 2007, "The Year of the Ballot," *Current History*, Vol.106, pp.51-57.

<sup>128</sup>同註 12，頁 248-249。

<sup>129</sup>同註 95，頁 344-345。

經濟問題影響債務惡化，造成以下幾點狀況：

第一、拉美國家經濟危機依舊：經歷 1980 年代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到了 1990 年代拉美經濟不穩定依舊持續發生危機。1994 年的墨西哥披索危機，1999 年的巴西經濟危機，以及衍生至 2001 年的阿根廷經濟危機，都是債務問題的衍生。比起拉美 1930 年代的債務危機，1982 年的債務危機影響更加深遠。

第二、國際經濟關係更加緊密：1990 年代不但有第三波民主浪潮，更有全球經濟問題相互影響的問題。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與俄羅斯經濟危機受到拉美地區影響，也反饋給拉丁美洲影響著該區發展。全球化的影響之下，各國相互的經濟危機也影響各國景氣發展。

從 1982 年債務問題開始，拉美國家的債務問題影響著拉美地區的發展。等到 1990 年代後，這種相互影響的關係日益加深。從 1994 年的墨西哥、1999 年的巴西，以及 2001 年的阿根廷，經濟危機相互拖累三國之間的发展。而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等國家的經濟危機，使得拉美國家與國家之間，以及拉美國家與國際環境之間，拖累了彼此的發展。

若以 1982 年債務危機為起點，在國際經濟影響下，到了 2001 年為止，這 20 多年來拉美地區發生經濟危機時有所聞。而問題的惡化，如 Robert Gilpin 所指出，都是因為國際經濟關係下緊密互動所造成的。<sup>130</sup>

---

<sup>130</sup> Robert Gilpin,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p. 317-328.

第三、新自由主義改革衍生問題：新自由主義改革不但未讓外債金額有效降低，甚至於造成拉美地區的社會運動衝突加劇。<sup>131</sup> 學者 Paul Almeida 進一步指出，在新自由主義改革導入拉美地區之後，衝突進入 1996 年以後持續增加。因此，新自由主義改革是造成拉美國家不穩定的因素之一。

從社會層面討論，債務造成拉美貧富不平等惡化。而探討貧富差距可從吉尼係數的高低觀察：數字越高表示財富越集中於社會少數人，貧富差異越大，一般國際的分類超過 0.4 就算是偏高。從表 5-2 可以發現，三個國家經歷債務危機近二十年後，貧富差異持續惡化，其中以巴西最為嚴重，而且三國均超過 0.4 的標準。

表 5-2：1998-2005 年拉美三國吉尼係數分布

吉尼係數	1998-1999	2000-2002	2003-2005
墨西哥	0.539	0.514	0.528
巴西	0.640	0.639	0.613
阿根廷（註）	0.539	0.578	0.526

註：阿根廷部分只包括國內城市地區。

資料來源：轉引自蘇振興，2008，《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發展報告（2007 年-2008 年）——社會和諧：拉美國家的經驗教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頁 353。

1990 年代的拉丁美洲，經歷過 1980 年代的經濟危機與改革，生活狀況尚未改善，具體反應在社會運動上。不論是墨西哥的薩巴達解放農民運動、巴西的無地農民運動，或是阿根廷因政府腐

<sup>131</sup> Paul Almeida, 2007, "Defensive Mobilization: Popular Movements against Economic Adjustment Policies in Latin America,"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ol.34, No.3, pp.123-139.

敗與貧窮衍生的社會及毒品氾濫問題，以及恐怖活動等，都可以反映出 1990 年代拉美國家隨著社會開放之下，衍生的社會問題。

在 1990 年代的民主化浪潮下，既有的非民主與封閉的社會結構雖未有巨大改變，但由於社會開始朝多元發展；加上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思想指導下，社會更加開放。這一波 1990 年代的全球化，國內社會比起之前更受到國際活動影響，進而提升拉美國家人民的相對剝奪感無法被滿足，因此社會不但出現動蕩，並且開始改變社會結構。

總言之，從 1930 年代的經濟大恐慌，渡過第二次世界大戰，拉美國家在二戰前的發展幾乎是「自給自足」的模式，加上拉美地區的天然資源，拉美各國政府因而行進口替代策略。但是，由於資本不足以及社會財富的不平等集中，使得拉美三國政府為發展經濟均依賴外資與債務。等到 1982 年從墨西哥開始，拉美三國先後受債務問題影響了國家發展。從此之後，三國債務持續累計，近二十多年的發展結果，從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債務金額持續增加，加大社會差距拖垮國家發展。近三年(2006-2008)來的債務問題，在左派政府上台後，因為國際政治的考量，以西方資本主義右派的國際金融機構為了「左右平衡」，不讓左派政治意識型態在拉美國家全面復甦，因此透過談判與對債權人說服，將債務做出減低與轉移的調整。但這種談判方式的調整，並未提升拉美國家償債力。



## 第六章 結論

###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拉美國家自獨立以來，為經濟現代化資本不足問題，向外引進外資與債務。在 1930 年代世界經濟大恐慌後，一方面依賴國外市場，但另一方面仍然依賴外資與債務。而 1982 年債務危機發生，除了有國際利率上升與石油危機的歷史巧合外，拉美始終依賴外國資金，與國際金融在二戰後，因應全球化緊密發展，使得 1982 年發生債務危機。

1980 年代後，世界經濟關係緊密發展下，使得國家負擔加劇，加上國際利率上升與石油問題影響，從墨西哥開始，拉美國家債務從問題變成危機，而債務危機進一步影響社會大眾，傷害人民生活。也由於生活問題，使得社會運動增加，同時因為民主化浪潮，使舊有的政治、經濟與社會層面有變更之可能。

當民主化浪潮在拉美開始，使民意因素介入債務問題處理上。而民主化後之執政者為求回應人民需求，以利持續執政，因此就必須在拉美債務問題上迎合民意，持續舉債。這三個新興民主國家在此軌跡下，形成對債務依賴的惡性循環。

債務問題自拉美獨立以來一直存在，其根本性原因是拉美政府政策選擇的方向，在政府政策選擇上經濟結構由於受政策影

響，產生對外資的依賴。而經濟不平等的關係，在拉美國家自十九世紀獨立以來一直存在。隨著世界民主化、全球化與國際經貿關係日益密切下，不平等差距加大，社會結構開始改變，並使拉美國家的人民「相對剝奪感」的不平衡加劇。

在政治與經濟因素影響下，使得拉美國家人民不滿上升，社會運動頻繁發生。就墨西哥、巴西與阿根廷三國而言，社會運動狀況與成因背景都不相同，卻代表同樣意義——對執政政府不滿。

加上 1980 年代的民主運動興起，1982 年的拉美債務危機正宣告了非民主政體的瓦解。在三國政府債務問題的不當處理後，在墨西哥的革命制度黨，即使統治長達 71 年，由於社會不滿的聲音，加上日益茁壯的在野黨，造成 2000 年的政黨輪替；而巴西與阿根廷軍政府分別在 1985 年與 1983 年下台，可見經濟問題處理不當造成的後果。因為民主化後，理性的選民決定自己命運時，新政府輪替上台後，機會具有深遠影響。<sup>132</sup>換言之，人民擁有改善生活的機會。

本研究發現拉美債務問題受政治、經濟與社會因素影響，可歸納出以下幾點：

1. 1980 年代由於拉美三國尚未民主化，負債發展的債務舉借政策不受監督，拉美國家舉債計劃發展下，各國政府身為債務的「行為者」，絲毫不受監督，所以使得三國國內的總統制運作下，而政黨體制因比例代表制的選舉造成多黨林立，使國會無過半多數加以監督，因此造成拉美政治上民粹主義相關問題。

---

<sup>132</sup>同註 126，頁 394-397。



2.民主化後，新自由主義的改革政策，雖欲求市場機制改善債務，期待市場自我調整，但由於拉美兩百年獨立以來的社會結構限制，使得貧富差距因債務問題更加惡化。因此，國家之所以無力處理債務，與結構限制發展造成國家失靈的狀況。

3.拉美國家身為債務國，債權談判不能僅止於「舊債轉換成新債」之策略，只求債權國的債務金額減免，未提升本身債務償還力。過份忽視國家產業結構的調整，以及出口能力的不足，都會使償債能力降低。

4.拉美國家 2006 年至 2007 年的左派政府勝選，包括巴西與阿根廷在內，使美國為首的債權國與債權銀行在國際政治考量下，重擬債務談判計劃，但未提升拉美國家的產業結構發展。拉美三國可以說是獨立前受殖民母國影響，獨立後又在此環境影響下，惡化社會的不平等問題。

5.債務用途的方向必須更加謹慎，用於非提升償債力的投資無疑是飲鴆止渴，另外從這三國政府自民主化後發生的總統貪污問題，也表示舉債發展的政策應避免領導人之貪污。

拉美債務問題的脈絡自十九世紀獨立以來已經存在，直到二戰後的世界經濟緊密結合與互動使債務問題開始嚴重；在 1982 年墨西哥宣布無力償債開始，債務影響了拉美國家近二十多年的發展。雖然債務問題近三年來因債權談判有所降低，但對拉美三國本身償債能力的培養並無助益。

從三國的吉尼係數差距均超過 0.4 的狀況觀之，債務問題之

所以影響拉美的發展，造成地區內的經濟危機時常發生，並不僅是債務金額本身的問題，而且國際經濟活動下，國家債務是幾乎各國無法避免問題。然而，拉美債務真正的危機在於，由於債務金額持續增加，加上地區內的貧富差距過大，因此使得拉美經濟危機時常發生；而本文探討阿根廷、巴西與墨西哥，也是因為這三個國家經濟規模足以影響拉美地區，因而使得拉美債務問題成為地區發展的絆腳石。

## 第二節 研究建議

拉美國家自獨立以來的兩百年間，經濟發展上根本的原因在於依賴國外資金與舉借債務，而資金與債務的使用始終未有效的解決拉美國家經濟發展與貧富差距問題，導致引發社會運動，使國家不穩定。

拉美貧富差距的環境持續惡化下，貧富差距問題使得基層人民生活困頓。因此，各國政府為呼應人民生活需要，並維持統治的正當性，特別是民主化後為求選舉的勝利，因此必須持續舉債以應付種種問題。

但就債務金額持續增加而言，從表 5-1 可以發現，債務金額大致上是持續增加的趨勢。因此可以了解拉美債務問題仍未解決。國家債務若在經濟發展的同時為求降低債，本研究從政治、經濟與社會方面有以下幾點建議：

- 1.在民主化後的拉美各國政府為求持續贏得選舉，並呼應人民的冀望，特別是經濟地位處在基層選民的要求下，對於債務處理僅只於債權的談判，三國政府債務的舉借與使用受到國內國會多黨體系影響下，難以形成多數監督總統舉債的作為，因而造成

債務的浪費。三國必須針對債務的舉借與使用建立起監督的機制。

2.國際機構與債權人借款給拉美政府，其動機也有投資盈利的目的。因此，直接要求國際金融機構與債權人，對拉美債務的赦免與取消是不可行的。然而，近年來拉美政府的選舉更替上，左派意識型態的政府紛紛掌權，在拉美地區獲得支持。這樣的左派勢力的興起，是否給予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債權方有所壓力，是拉美債務發展致值得關注的地方。

3.債務危機本身是經濟危機之一，對於危機的處理，就拉美國家而言，債務用途成為債務金額處理能否降低之關鍵。若能排除資金被貪污、甚至於不用於購買軍火，轉為投資於國內經濟基礎的建設上，雖然需要長期時間才能發揮效果，但相關的基礎建設投資相信時機成熟之時，能夠改善拉美國內經濟情況。

4.拉美各國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而這些資源不啻為國家經濟發展的優勢。各國應檢視國內天然資源，並調整國內的產業結構，並記取進口替代的教訓，以世界各國為市場，加強國家的出口產業。

5.隨著全球化的影響，拉美國家的發展上應檢討國內人才的培養，持續增進教育的開辦，提升國內人才水準，使國內社會的階層流動成為可能，才有機會改變自獨立以來社會結構的問題。

債務危機乃經濟危機之一種，而經濟危機就是信心危機。拉美債務危機自 1982 年以來由於無法確實處理，使得國際與拉美地區人民的信心不足，造成國內外對拉美各國政府的信心危機。因此，如何針對國際債權人（機構）與國內人民提升對信心，從政

治、經濟與社會等方面著手改善，是拉美各國政府應深思的。

# 參考書目

## 壹、中文部分

### 一、書籍

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譯，Leslie Bethell 主編，1991，《劍橋拉丁美洲史——第八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中國電視台《大國崛起》節目組，2006，《大國崛起-葡萄牙/西班牙》。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

王廣信、趙麗娜，2002，《當代世界經濟》。北京：人民出版社。

王德迅、張金杰，2004，《列國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江心學譯，Ronald H.Cholcote 著，2004，《替代拉美的新自由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江時學，2004，《當代拉丁美洲經濟發展》。台北縣：淡江大學出版中心。

\_\_\_\_\_，2004，《金融全球化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安全——拉美國家的經濟教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_\_\_\_\_，2004，《阿根廷危機反思》。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朱柔若譯，Neuman W. Lawrance 著，2000，《社會科學研究法——質化與量化取向》。台北：揚智。

向駿，2001，《拉丁美洲研究》。台北：五南。

李任初，1992，《新自由主義——宏觀經濟的蛻變》。台北：臺灣商

- 務印書館。
- 李明德，1999，《1999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發展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李芳齡譯，Noreena Hertz 著，2008，《當債務吞噬國家》。台北：天下雜誌。
- 呂銀春，2003，《經濟發展與社會公正—巴西實例研究報告》。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 \_\_\_\_\_、周俊南，2003，《列國志：巴西》。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宋曉平，2005，《列國志：阿根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宋鎮照，1995，《發展政治經濟學—理論與實踐》。台北：五南。
- 何國世，2003，《墨西哥史—仙人掌王國》。台北：三民。
- \_\_\_\_\_，2007，《阿根廷史—探戈的故鄉》。台北：三民。
- \_\_\_\_\_，2008，《巴西史—森巴王國》。台北：三民。
- 拓夫譯，Barrington Moore 著，1991，《民主與獨裁的社會起源》。台北：桂冠。
- 周志杰譯，Todd Landman 著，2002，《比較政治的議題與途徑》。台北：韋伯文化。
- 洪育沂，1998，《拉美國際關係史綱》。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 袁東振、徐世澄，2003，《拉丁美洲國家政治制度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 郝名瑋、馮秀文與錢名德，1998，《外國資本與拉丁美洲國家的發展——歷史沿革的考察》。北京：東方出版社。
- \_\_\_\_\_與徐世澄，2008，《拉丁美洲文明》。福建：福建教育出版社。
- 索薩，2003，《拉丁美洲思想史述略》。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 張才國，2007，《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北京：中央編譯。
- 張明貴譯，Soymour M.Lipset 著，1982，《政治人》。台北：桂冠。

- 張寶宇、周子勤與呂銀春，1993，《拉丁美洲外債簡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張寶宇，2002，《巴西現代化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 陸國俊、金計初，1997，《拉丁美洲資本主義發展》。北京：人民出版社。
- 彭懷恩，2003，《政治學理論與方法論 Q&A》。台北：風雲論壇。
- 湯世鑄，1996，《拉丁美洲軍人政權之研究》。台北縣：知書房。
- 葉爾莫拉耶夫主編，北京翻譯社譯，1972，《阿根廷史綱》。北京：三聯書店。
- 蔡東杰，2002，《台灣與墨西哥民主化之比較》。台北：風雲論壇。
- 劉煥卿譯，Boris Fausto 著，2006，《巴西簡明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蘇子喬譯，Mark Irving Lichbach, Alan S. Zuckerman 著，2005，《比較政治》。台北：五南。
- \_\_\_\_\_，Ronald Chilcote 著，2005，《比較政治與政治經濟》。台北：五南。
- 蘇彥斌，2006，《墨西哥的社會運動與民主化》。台北：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 蘇振興，2006，《拉美國家現代化進程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_\_\_\_\_，2006，《2005 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發展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_\_\_\_\_，2008，《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發展報告(2007-2008)——社會和諧：拉美國家的經驗教訓》。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顧瑩華，1992，《巴西經濟的發展與危機》。台北：中華經濟研究院。

## 二、期刊

- 朱欣民，2005.2，〈巴西落後地區開發的經濟與社會成效評價〉，《拉丁美洲研究》，第 27 卷，第 1 期，頁 18-24。
- 江時學，2002.4，〈阿根廷危機的由來及其教訓〉，《拉丁美洲研究》，第 2 期，頁 1-11。
- 沈安，2003.6，〈阿根廷債務危機的形成與啟示—阿根廷金融危機探源之二〉，《拉丁美洲研究》，第 3 期，頁 15-18。
- 宋興洲，2003.12，〈重新思考國家：從政治經濟到文化政治經濟〉，《政治學報》，第 35 期，頁 101-163。
- 徐世澄，2002.4，〈墨西哥銀行的私有化和外國化的進程〉，《拉丁美洲研究》，第 2 期，頁 24-27。
- 徐世澄，2003.6，〈簡析 1982~2003 年墨西哥的經濟改革和發展〉，《拉丁美洲研究》，第 6 期，頁 24-34。
- 徐世澄，2005.12，〈巴西勞工黨政府應對社會矛盾的主要作法〉，《拉丁美洲研究》，第 27 卷，第 6 期，頁 9-14。
- 陳琪，1995，〈墨西哥金融危機之啟示〉，《今日合庫》，第 7 期，第 21 卷，頁 29-35。
- 陳進安著，2006 年，〈巴西金融危機〉，《中國商銀月刊》，第 18 卷第四期
- 賀欽，2005.6，〈拉美左派力量和公民運動的前沿〉，《拉丁美洲研究》，第 27 卷，第 3 期，頁 48-51。
- 蔡東杰，1999.11，〈巴西在第三波民主化過程中的轉機與危機〉，《問題與研究》，第 38 卷，第 11 期，頁 77-90。

### 三、論文

- 丁健民，2006，〈新自由主義發展策略模式與二零零一年阿根廷金融危機關係之研究〉，碩士論文，淡江大學拉美研究所。



- 王瑤瑛，1999，〈國際貨幣基金的組織與功能〉，碩士論文，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
- 余文婷，2004，〈從北美自由貿易區探討美墨雙邊貿易：1994 - 2003〉，碩士論文，淡江大學拉美研究所。
- 林進煌，2005，〈金融危機之國際比較研究〉，碩士論文，政治大學行政管理研究所。
- 徐韻媛，2006，〈布爾喬亞對社會文化發展之影響—以墨西哥為例〉，碩士論文，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
- 梁玉玲，2006，〈阿根廷梅南主義之研究〉，碩士論文，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
- 陳冠志，2005，〈全球治理模式下國際貨幣基金之角色與轉型〉，碩士論文，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
- 陳淑敏，2007，〈阿根廷勞工運動之研究(1878-1999)〉，碩士論文，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
- 黃仲一，2005，〈墨西哥原住民的權利追尋：以薩帕帝斯塔民族解放軍與政府關係為中心(1994-2004)〉，碩士論文，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
- 黃靖媛，2000，〈過去廿年世界主要金融危機之解析與省思〉，碩士論文，中正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
- 葉長城，2007，〈誰否決？新興市場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政治分析：智利、南韓與巴西經驗的比較〉，博士論文，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
- 葉姿攸，2005，〈九零年代外國直接投資對阿根廷經濟發展影響之研究〉，碩士論文，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
- 廖鴻達，2000，〈一九九零年代巴西經濟改革的政治經濟分析〉，碩士論文，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
- 劉詩馨，2006，〈巴西經濟政策與貧窮問題(1990-2002)〉，碩士論文，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

蕭勇毅，2005，〈墨西哥政治變遷與外資發展之關係〉，碩士論文，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

鍾宛諭，2007，〈拉丁美洲新興左派興起因素之研究〉，碩士論文，淡江大學拉丁美洲研究所。

龐君豪，1995，〈巴西民主化過程之研究〉，碩士論文，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

#### 四、網路資料

陳平，2005.8.24，〈華盛頓共識的失敗與經濟學變革方向〉，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40536/3390969.html>。

## 貳、西文部分

### (I)Books

Arceneaux, Craig and David Pion-Berlin, 2005, *Transforming Latin America—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Origins of Change*. United States: Pittsburgh Press.

Armella, Pedro, Rudiger Dornbusch and Maurice Obstfeld, 1983, *Financial Policies and the World Capital Market: The Problem of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Bianchi, Andres, Robert Devlin and Joseph Ramos, 1985, *External Debt in Latin America*.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Borensztein, Eduardo, Eduardo Yeyati and Ugo Panizza, 2006, *Living with Debt- How to limit the Risks of Sovereign Finance*.

- Washington, DC: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 Buxton, Julia and Nicola Phillips, 1999, *Developments in Latin American political economy: states, markets and actors*.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Caporaso, James and David Levine, 1992, *Theories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 Clark, Barry, 1998, *Political Economy: A COMPARATIVE APPROACH*. Connecticut: Greenwood.
- Gauhar, Altaf, 1985, *Regional Integration: The Latin American Experience*. Colorado: Westview.
- Gilpin, Robert, 198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 Gottschalk, Ricardo and Patricia Justino, 2006, *Overcoming Inequality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Routledge.
- Hamnett, Brian, 2000, *A Concise History of Mexico*. United Kingdom: Cambridge University.
- Jochnick, Chris and Fraser Preston, 2006, *Sovereign Debt at the Crossroad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 Jones, Stephany and Osvaldo Sunkel, 1987, *Debt and development crises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aufman, Robert, 1988, *The Politics of Debt in Argentina, Brazil, and Mexico*.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Kirby, Peadar, 2003, *Introduction to Latin America: Twenty – first Century Challenge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 Larsen, Stein, 2005, *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NY: Columbia University
- Leone, Richard, 1992, *In The Shadow of The Debt-Emerging Issues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Twentieth Century Fund Press.

- Marsh, David, 2002, *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Millet, Danien and Eric Toussaint, 2004, *Who Owes Who? 50 questions about world deb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Pang, Eul-Soo, 2002,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Transformation in Argentina, Brazil and Chile since 1960*.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Potter, George, 2000, *Deeper than Deb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poor*. London: Latin America Bureau.
- Ritter, Archibald and David Pollock, 1983, *LATIN AMERICAN PROSPECTS FOR YHE 1980S*. New York: Praeger.
- Sachs, Jeffrey, 1989, *Developing Country Debt and the World Econom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 Stallings, Barbara and Robert Kufman, 1989, *Debt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Colorado: Westview.
- Urquidi, Marjory, 1979, *Dependency an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World Bank,The, 2006,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 Wynia, Gary, 1990, *The politics of Latin American developmen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 **(II)Periodicals**

- Almeida, Paul, 2007, “Defensive Mobilization: Popular Movements against Economic Adjustment Policies in Latin America,”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ol.34, No.3, pp.123-139.
- Balinski, Michel and Victoriano Gonzalez, 1999, “Mexico’s 1997

Apportionment defies its electoral law,” *Electoral Studies*, Vol.18, pp.117-147.

Castañeda, Jorge and Patricio Navia, 2007, “The Year of the Ballot,” *Current History*, Vol.106, No. 697, pp.51-57.

Davis, Diane, 1990, “Social Movements in Mexico’s Crisi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43, No.2, pp.343-367.

Fitzgibbon, Russell, 1956, “A Statistical Evaluation of Latin-American Democracy,”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9, pp.607-619.

Klesner, Joseph, 1998, “An Electoral Route to Democracy?”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31, pp.477-497.

Larkins, Christopher, 1998, “The Judiciary and Delegative Democracy in Argentina,”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31, pp.423-442.

### **(III)Internet**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7.10.17, “Data and Statistics,”  
<http://www.imf.org/external/data.htm>.